



官方微信二维码



智库微信二维码



发展与交流中心二维码



社会调查中心二维码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01 号中惠楼

电话：020-85221755

邮箱：iesr@jnu.edu.cn

官网：<http://iesr.jnu.edu.cn>

微博：@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是智库的发声平台，为公众提供更加专业、客观、科学的观点。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展与交流中心，致力于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培训，帮助国内学子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采用全英语教授数理、经济相关知识，提供免费的专业英语培训。

社会调查中心隶属于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致力于开展多项大型、前沿的社会调查项目，为经济学研究以及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打造优质的学术公共产品，支撑研究院在相关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乡村振兴

2022年
广东乡村振兴
—— 高端论坛 ——

主办单位：暨南大学
承办单位：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暨南大学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

季刊 | 2022年
10-12月

- ▶ “献礼党的二十大，培根铸魂育新人”教师教学竞赛暨课程思政大赛顺利举办
- ▶ 我院七周年院庆暨 2022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顺利举行
- ▶ 2022 年广东乡村振兴高端论坛顺利举办

学院简介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 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是暨南大学为建设高水平大学、推行经济学教育科研国际化而设立的教学科研机构。研究院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应用经济学学科, 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 进行国际水准的学术研究, 提供高质量本科生及研究生教育, 建设高水平智库。研究院聘请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冯帅章教授为院长。2017 年 11 月, 研究院荣登《中国智库综合评价 AMI 研究报告 (2017)》核心智库榜单。2018 年 2 月, 我院名列《2018 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社会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名榜前十。

师资建设方面, 研究院延揽多名海内外知名高校优秀博士毕业生, 聘请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知名学者担任特聘教授, 打造一流的国际化师资队伍, 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考评标准体系。学生培养方面, 借鉴北美一流经济系的培养模式设立本科、硕士及博士项目, 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且立足本国现实国情, 能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人才。

为了提升科研实力, 研究院成立五大科研机构: 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中心、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心及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劳动经济学中心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共同创建“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 由冯帅章教授与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 James Heckman 教授共同担任负责人。2019 年, James Heckman 教授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

此外, 研究院下设三大职能中心: 社会调查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和发展与交流中心。社会调查中心旨在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 为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微观数据。目前已开展的调查项目包括: 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中国家庭就业调查、广东省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查、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广东千村调查等。政策研究中心旨在数据收集及学术研究的基础上, 针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关政策研究, 提供高水平的智库服务。发展与交流中心致力于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培训, 帮助国内学子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 采用全英语教授数理、经济相关知识, 提供免费的专业英语培训。目前已与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美国西北大学、美国德州 A&M 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纽约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开展海外硕士合作项目。

目录 CONTENTS

01	学院要闻	
	“献礼党的二十大, 培根铸魂育新人” 教师教学竞赛暨课程思政大赛顺利举办	02
	我院召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工作部署会	05
	我院七周年院庆暨 2022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顺利举行	06
	情浓冬日, 相会云端! 我院校友论坛顺利举办	09
	笃行不怠, 赓续新篇, 我院 2022 年度回顾	12
02	科研动态	
	科研立项	16
	论文发表	16
03	学术活动	
	暨南论道	18
04	思想聚焦	
	2022 年广东乡村振兴高端论坛专题	20
	暨济一堂	33
05	数据调查	
	“社会调查与应用” 系列讲座	43
06	学生天地	
	培养动态	47
	学子风采	48

学院要闻

“献礼党的二十大，培根铸魂育新人” 教师教学竞赛暨课程思政大赛顺利举办



为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示范作用，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充分发挥教师在人才培养中的思想引领作用，全面推进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以良好的精神风貌献礼党的二十大，11月9日，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联合举办“献礼党的二十大，培根铸魂育新人”教师教学竞赛暨课程思政大赛。

本次教学竞赛分本科课程教学竞赛和新任教师教学竞赛两个赛道进行，邀请经济学院教授郑贤、冯海波，副教授刘沛、徐林清、余英和研究院副教授蔡澍、苏应俊担任评委。经济学院、研究院院长冯帅章，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成品兴出席。竞赛由经济学院副院长蒋海主持。



蒋海



竞赛评委

竞赛正式开始前，冯帅章院长在致辞中表示教学基本功应该是每位教师最应具备、最基本的职业素质，暨南大学经济学科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省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中都取得过优异的成绩，希望各位选手今日赛出水平、赛出风格，继往开来，积极推动竞赛成果转化到日常教学中去，以赛促教，促进整体教学质量的再提升。同时，经济学科也将进一步搭建好青年教师成长平台，更新完善教学激励机制，鼓励老师钻研教学，从奖励制度上加大教学评分占比，全面助力青年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



冯帅章

本次联合教学竞赛得到两院 20 余位教师积极响应，因疫情防控等原因，最终共 18 位教师到场进行比拼。其中，刘丛、蒲华林、薛森、侯雅文四位教师进行本科课程竞赛；张阳阳、王艳真、柯书尧、朱天运、康明石、王曦、於洋、李绍腾、杨仁琨、刘晓玉、上官若、郑立、邹航、刘一鸣十四位教师进行新任教师教学竞赛。



依次为：刘丛、蒲华林、薛森、侯雅文、张阳阳、王艳真



依次为：柯书尧、朱天运、康明石、王曦、於洋、李绍腾

参赛教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比赛中，根据学科课程特点和实际学情，各自精心准备了完整教学节段的教学设计及对应 PPT，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课时进行了 20 分钟现场讲课，授课内容涵盖中国经济史、国民收入、公共事业管理、货币系统、线性回归、数字贸易等内容，充分展示了扎实的理论功底。



依次为：杨仁琨、刘晓玉、上官若、郑立、邹航、刘一鸣

本次联合竞赛进一步激发了青年教师更新教育理念和掌握现代教学方法的热情，达到了以赛促教的既定目标。未来，研究院将持续加大对青年教师的培育、对学生课堂的关注、对教学建设的投入，将“以本为本”“精课精师”的口号落实到行动，推动本科教学水平再上新台阶。

我院召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工作部署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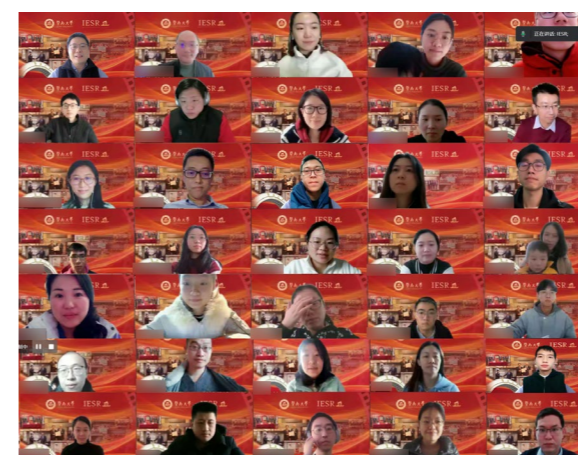
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引导全体师生员工自觉用党的二十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全面做好研究院各项工作紧密结合，11月4日下午，我院组织召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工作部署会。

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全院师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一是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要原原本本、细心钻研党的二十大报告和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充分掌握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围绕五个“牢牢把握”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基本要求。二是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践行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结合职责职能，不

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技能，勇于自我革命，为研究院发展探索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三是严格落实学习措施。采取党政联席会专题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教职工大会、邀请专家讲授、集中自学等形式开展学习。

研究院与调查中心领导班子成员与教職員工代表参加了会议。

我院七周年院庆暨 2022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顺利举行



参会师生云端合影



冯帅章院长

12月30日下午，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7周年院庆暨2022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以线上的形式顺利举办。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出席了活动并作致辞。副院长卢晶亮担任本次活动主持人。百余位 IESR 师生同时在线观看并参与互动，重温 IESR 2022 年的成长点滴，共贺 IESR 的 7 周岁生日。

活动伊始的致辞中，冯帅章院长表示，这7年对于 IESR 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IESR 克服了很多困难也收获了喜人的成绩，在此期间离不开全体师生的共同奋斗和互相扶持，这让我们更有底气共面疫情难关，也更加珍惜共建学校综合改革示范区过程中的荣誉和成绩。致辞的最后，冯帅章院长送上了朴实而温暖的祝福：“岁末年终，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快快乐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随后，活动进入总结表彰环节。研究院党支部书记薄诗雨，副院长张思思、史炜、卢晶亮，社会调查中心执行主任李芮，院长助理崔潇濛从思政工作、科研

成果、学生培养、智库建设、数据调查以及行政工作六个方面对研究院这一年的成绩进行总结，并对各领域中做出突出贡献和表现优异的研究院教职工及学生进行表彰。



研究院党支部书记薄诗雨



副院长张思思



副院长史伟



副院长卢品亮



社会调查中心执任何李芮



院长助理崔潇濛

随着主持人卢品亮宣布活动进入尾声，参会师生纷纷通过留言弹幕表达对 IESR 成立 7 周年的祝福和美好期盼。活动的最后，各参会师生还进行了“云端”合影，将这个师生共欢的温情时刻共同记录留存。至此，暨南 IESR 7 周年院庆暨 2022 总结表彰大会圆满结束。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2022年度 先进个人及团体表彰名单

思想政治工作

优秀思政工作者
武茜

科研工作

课题申请优秀表现奖
李润梁 邱筠 唐高洁 王子健

优秀帮扶专家奖
蔡澍 严子中

学生工作

优秀学生工作奖
苏应俊 马森 张毅 刘丛

学生工作特别贡献奖
郑立 朱宏佳 苏应俊 张毅 刘诗濛 邱筠 刘丛

最佳教学奖
唐曲 郑立 张毅 严子中

智库建设工作

乡村振兴突出贡献奖
李书娟 韩昱洁 唐高洁

智库积极贡献奖
刘诗濛 严子中 何李芮

研究支持奖
钱文文 周浩然 卓依

最佳服务奖
卢品亮 李承政 武茜

最佳传播奖
丘宇璐 余旭楷

对外联络奖
李步清

数据调查工作

华南调研界天花板团体奖
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全体职工

卓越引领奖
张玉美 刘闻芝

锐意突破奖
易奔

特别贡献奖
李步清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突出贡献团队奖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全体行政职工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2022年度 优秀学生表彰名单

优秀本科生一等奖

刘赢轩 邹新颖 蒋林池

优秀本科生二等奖

庞雅丹 王海润 韩伟琪 陈瀚瀚 唐梦铃 杨楠

优秀本科生三等奖

马俊颖 王欣盼 卫珂妍 吴嘉颖 刘响轩 彭晨熙

优秀硕士生一等奖

李玮 仲政

优秀硕士生二等奖

魏婧冉 范敏宜 鲍悦 程琳

优秀博士生

甘雨 万倩 王逸飞

情浓冬日，相会云端！我院校友论坛顺利举办

12月3日-4日，为促进优秀校友与在校同学的经验交流，我院特邀请15位校友就硕士深造、博士深造及就业三个专题开展三场校友论坛。论坛通过线上方式举办，吸引了120余位同学报名参与。我院薄诗雨副教授、朱宏佳副教授、严子中助理教授各主持了一场校友论坛活动。

IESR校友系列论坛 第一场——硕士深造专题



江心月
2017级本科生

江心月现就读于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电子信息（金融科技方向）硕士项目。江心月从考研的初试、面试两个阶段详细分享了她本人的备考经验，鼓励同学们要有长远的规划、不轻易放弃的精神以及一颗平常心来应对考研。



詹子旖
2018级本科生

詹子旖现就读于美国杜克大学经济学专业硕士项目。詹子旖分享了自己申请海外各个高校经济学硕士项目的经验，全面地介绍了材料准备、学校与专业选择、申请时间线等各方面的申请准备工作，为同学们提供了宝贵的一手经验。



许笑寒
2018级本科生

许笑寒现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应用分析专业硕士项目。许笑寒重点介绍了以就业为导向的海外商科类硕士，对多个知名海外商科类硕士进行分析，为同学们介绍了海外商科类硕士就业的利弊以及求职技巧等实用信息。



林炳锟
2018级本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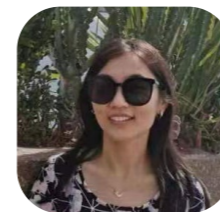
林炳锟现就读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金融专硕（金融计量方向）。林炳锟分享了备考金融专硕的经验和读研的感受，鼓励同学们做好未来规划，提早开始准备，珍惜本科时光，学好专业课，提高学习成绩。



刘明锐
2018级本科生

刘明锐现就读于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硕士项目。刘明锐分享了申请香港地区高校硕士项目的时间规划，香港留学的经历，建议同学们利用好 IESR 的资源。

IESR校友系列论坛 第二场——博士深造专题



韩亚婕
2016级本科生

韩亚婕现就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项目。她分享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项目的申请经验以及读博期间经历，详细介绍了该校可申请的项目方向、博士阶段选课、考核及管理方式等内容。



王孟焜
2018级硕士生

王孟焜现就读于瑞士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高等学院博士项目。她介绍了该项目的招生及就读情况，并详细分享了欧洲其他博士项目申请经验。



吕佳玮
2017级硕士生

吕佳玮现就读于匹兹堡大学博士项目。她分享了读博期间的求学经验和感受，尤其是与导师和同学们的相处日常。



李蔚
2016级本科生

李蔚现就读于香港科技大学博士项目。李蔚重点介绍了香港地区的博士项目情况，并分享了博士项目申请经验。他为学弟学妹们提出了几点建议：1. 积极寻求研究助理的机会；2. 在校期间提高自己的平均学分绩点；3. 不要局限于申请纯经济系的博士项目，可多关注商科等类型的其他项目；4. 注意英文写作方法。



赵毅
2018级硕士生

赵毅现就读于清华大学博士项目，已有研究成果发表于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China economic review。他重点分享了在 IESR 就读期间的体验，认为 IESR 师资队伍、培养方案、实践活动等对于学生的学习能力及科研成长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IESR校友系列论坛 第三场——就业专题



黄稚雯
2016级本科生

黄稚雯硕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量化方法专业。现就职于美国发现金融公司（Discover Financial Services），从事反欺诈风险管理的数据分析工作。她建议同学们如果想要在毕业后留美工作，可倾向于选择偏就业导向的硕士项目，并且具有STEM、有3年的OPT机会的项目。她介绍了自己所在的行业和岗位特点。



张浩然
2016级本科生

张浩然现就读于美国东北大学计算科学理科硕士项目并在美国微软公司实习。他给师弟师妹提供了以下建议：一是明确自己的职业选择和偏好；二是悲观地准备面试，乐观地寻求机会；三是不要给自己设限，尝试尝试再尝试，主动出击。



龙鹏
2017级本科生

龙鹏现就职于招商银行深圳分行。他介绍了商业银行的岗位体系与晋升机制。他认为，对于想要选择在银行业发展的师弟师妹首先应判断自己是否适合银行或者营销类的岗位，结合自己的性格特点和职业规划来进行理性判断。



范李天琦
2017级本科生

范李天琦硕士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应用经济学专业，现就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从事全职研究助理工作。她分享了自己在新加坡硕士毕业后申请成为全职研究助理的经验，包括详细的申请和面试过程，以及主要工作内容和体验。



胡嘉齐
2019级硕士生

胡嘉齐现就职于VIVO公司。她详细地分享了在求职过程中从如何选择行业和企业、如何做好个人职业定位和职业规划、如何从校园向职场过渡等系列准备，帮助师弟师妹提前做好全面准备，也分享了最新的行业资讯。

除了经验分享，本次校友论坛还提供了充足的自由交流环节，同学们就自己关心的留学申请、求职、考研、就业等各方面的问题向师兄师姐提问，所有校友都耐心地进行了解答。优秀校友的个人成长经验分享让同学们在学业规划上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领悟，并发挥了榜样示范作用，激励同学们用奋斗书写青春，用拼搏成就梦想。

笃行不怠，赓续新篇，我院2022年度回顾

回望过去的一年，研究院全体师生携手风雨，笃行不怠，在学术科研、国际交流、人才培养、数据调研、智库建设等各方面都写出了圆满的答卷。

以下，让我们一起对这一年的美好时刻进行重新梳理和记录，笑看来时路，阔步新征程！

01 学术科研篇

为建设一支具备国际视野且立足本国现实国情、极具科研创造力的优秀队伍，研究院严把人才引进关，优化师资队伍结构，2022年新引进了2名海外人才，分别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罗彻斯特大学。目前共有全职教师41人，境外教育背景人才比例高达90%。

国际论文发表成绩单上，研究院今年再添亮眼一笔。2022年研究院全职教师在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或被正式接收论文达27篇，其中包括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经济学（季刊）》等国内外权威期刊，助推应用经济学排名持续攀升。根据2022年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2022年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暨南大学经济学学科均排进全国前十，位列全省首位。同时，暨南大学经济学与商学在2022年9月首度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

科研立项方面，研究院也是佳音不断。2022年度研究院共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项、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团队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2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1项。

02 国际交流篇

2022年，新冠疫情的影响仍在持续。疫情面前，研究院坚持“国际化”的办院特色，积极开展高频率、高质量、多样化的学术活动，营造浓厚学术氛围，支撑暨南师生开展国际水准的学术研究，促进暨南经济学学科高质量发展。

依托互联网及线上会议平台，研究院本年度共举办学术活动超40场，总计参与超2000人次，其中与海外院校、学术机构共举办国际学术会议6场，包括IESR数量宏观经济学研讨会、第五届IESR-GLO劳动经济学研讨会等。常规Seminar学术讲座27场，平均每两周就有1位嘉宾来研究院交流。高端系列学术讲座“暨南论道”共举办5场，邀请了耶鲁大学陈晓红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Patrick Kline教授、康奈尔大学Panle Jia Barwick教授等一流学者开展线上讲座。此外，研究院还定期组织如实证经济阅读小组、brownbag semina分享会以及针对研究院青年教师学术能力发展等研究院内部活动，促进了师生间的合作交流。

同时，研究院继续与芝加哥大学第六年合作举办“社会经济不平等”暑期学校，共收到超150名全球学者申请，最终审核通过来自全球五大洲46所大学或机构的64名青年学者进行参营。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期学校授课团队由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Heckman教授领衔，授课教师还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Petra Todd教授、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胡颖尧教授、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史晓霞教授以及中国台湾中研院许育进教授。研究院还积极拓展海外硕士培养和交流项目，与3所海外院校结成新的合作，目前，共与8所海（境）院校签订了15项合作项目。

03 人才培养篇

今年研究院人才培养方面呈现出“量增质升”的良好态势，学生科研成绩结硕果，毕业去向良好。研究院继续与外国语学院合作开设“国际组织精英人才实验班”，以“第二课堂”的形式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4-11月，暨南大学经济学科首届“新文科经济学拔尖人才计划”顺利完成第一期科研训练，共选拔22名学生参加，累计完成了近20次经济学相关的理论与实践课程，并举办了10余次师生午餐会，2次学生汇报，取得了良好培养效果和学子积极反馈。

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研究院学生获“国-省-校”三级立项共17项，2022“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赛获银奖、铜奖各1项，取得该赛事零的突破。值得一提的是，2019级本科生廖浩业与导师马森合作论文（合作者：Hao Xue）被国际权威期刊China Economic Review接受发表。另外，还有多位老师共同指导本院研究生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论文，如香港大学在读博士生周彦（IESR 2020届硕士毕业生）与薄诗雨副教授、刘丛副教授的合作论文发表于发展经济学顶级期刊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20级硕士生魏婧冉与史炜副教授的合作论文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China Economic Review，2019级博士研究生李景荣与李博文的合作论文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等。

2022年的37名本科毕业生超过六成成功升学深造，其中境外知名高校升学占比80%，值得一提的是境外录取院校均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2022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的境外知名高校，两名本科生更是直接获得北美、英国应用经济系博士项目offer。

以优教促优学，研究院一直以来都重视教学质量，鼓励青年教师打磨教学功底，积极参加教学竞赛，今年更是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青年教师陈思宇老师获得广东省第六届高校（本科）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

的佳绩。同时，研究院还获得两项校级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立项，分别是严子中老师主编的《计量经济学编程》课程获得教材资助项目立项和依托研究院下辖的社会调查中心建立的暨南大学社会调查大学生社会实践教学基地获准立项。

04 数据调研篇

2022年，研究院下辖的社会调查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坚持脚丈南粤乡土，以数据记录民情呼声与社会发展动态。中心核心项目广东千村调查顺利完成第五轮实地访问。今年共计156名高校学子作为访问员和核查员参与到广东16个区县的入户访问和数据质量控制工作中，通过中心完全自主开发的计算机辅助面访系统，采集有效样本63个行政村和1757户农村家庭，行政村层面样本追访率100%，家户层面追访率达91.4%。

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进一步深化儿童早期发展研究，新增了书信陪伴和课程干预实验，并正根据疫情政策第五轮追踪访问作动态调整。多年收集的数据也正逐步产出学术成果。今年年初，项目发起人冯帅章教授、助理教授韩昱洁和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绵竹项目顾问詹姆斯·赫克曼教授级团队基于绵竹儿童数据合作形成的论文Comparing the reliability and predictive power of child正式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NAS)，论述了关于儿童非认知能力科学测量方式的研究成果。

基于与多个政府部门及兄弟高校的良好合作关系，今年，中心还承担了乡村振兴政策评估、扫黑除恶等与民生热点息息相关的委托调查项目。发挥自身调查专业优势，支撑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行稳致远。

调查执行的背后，是中心对自身技术核心的专业化和智能化发展的注重，是对建设高质量数据库目标的追求。今年，中心自主开发的调查系统已通过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二级认证，为调查执行和数据安全保驾

护航。在数据库建设方面，中心持续运行和维护数据平台，为暨大经济学科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此外，中心还积极盘活调查资源，搭建专业交流平台，创新实践形式助力育人。2022年中心共举办“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7期，共吸引1300余名国内外听众参与；开设了本科生通选课“调查方法与应用”，促进广大师生拓展调查数据领域视野，积攒学术功底和素养。

05 智库建设篇

今年研究院联合乡村振兴研究院继续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开展多项大型社会调查及专项调研，产出丰硕的调研成果和政策成果。年内研究团队先后赴佛山碧桂园万亩农业产业园、清远英德调研农业产业园、阳江乡村等地开展实地调研并形成了相关调研报告。9月，研究院受政府部门委托，还开展了广东乡村振兴政策调查评估项目的实地调研，了解近年来广东乡村振兴政策实施情况。2022年共完成《广东千村调查2021年研究报告》等5篇大型调研报告。同时，研究院精准对接政策需求，为相关部门提供智力支持，共计报送智库专报18期，其中《五华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共同富裕“擂台赛”模式分析报告》获批示。

以交流促提升，2022年研究院还积极邀请了学界、业界的资深专家开展13期“乡村振兴大讲堂”，举办了“第六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2022年广东乡村振兴高端论坛等高质量的政策论坛，筑造高水平政策研究交流平台。另外，为激发青年研究员创新和提升，研究院设立了年度研究课题，吸引各全职以及兼职研究员积极申报，为乡村振兴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资助支持。

结语

站在崭新起点上，研究院将以昨日为滋养，坚定初心，持续深耕中国经济学，立足实际谋大局，脚踏实地做研究，积极做好本土与国际的学术交流桥梁，坚持培育有远大理想、有家国情怀、有责任担当、有真才实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肩负立德树人、科研创新、服务国家等重大使命而砥砺前行。

科研动态

科研立项

我院副教授刘诗濛获批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自然科学基金青年提升项目

近日,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委员会公布了2023年度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自然科学基金拟资助项目清单,共有3449项获得立项,其中面上项目2999项,青年提升项目300项,杰出青年项目120项,卓越青年团队项目30项。

我院副教授刘诗濛的课题《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增长极辐射作用空间衰减的成因、影响与对策: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获批青年提升项目,立项情况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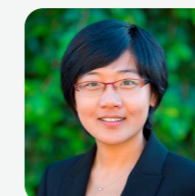
课题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类别	项目经费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增长极辐射作用空间衰减的成因、影响与对策: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刘诗濛	青年提升项目	30万

论文发表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我院副教授薄诗雨(左上图)、刘丛(左下图)与2020届硕士毕业生周彦的合作论文“Military investment and the rise of industrial clusters: Evidence from China’s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被发展经济学顶级期刊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接受发表。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

我院助理教授郑立的合作论文“Optimal Model Averaging of Mixed-Data Kernel-Weighted Spline Regressions”(合作者: Jeffrey S. Racine, Qi Li, Dalei Yu)被数量经济学著名期刊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接受发表。



暨南论道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付超教授 线上讲座顺利举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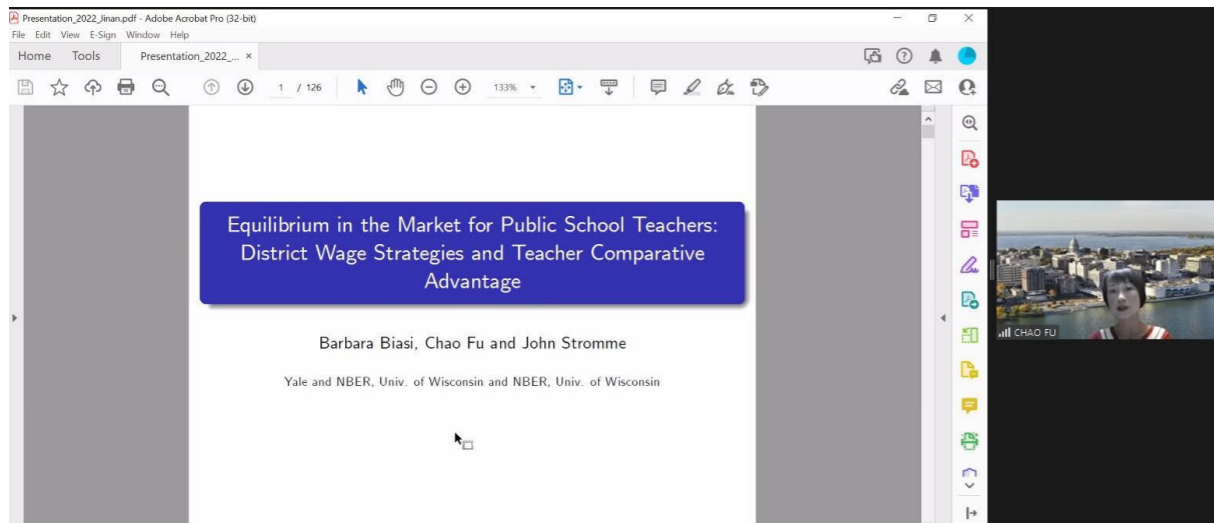
学术活动



北京时间 2022 年 11 月 21 日上午，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付超教授受我院“暨南论道”活动邀请，分享题为 Equilibrium in the Market for Public School Teachers: District Wage Strategies and Teacher Comparative Advantage 的合作研究文章。讲座由我院助理教授 Jun Hyung Kim 主持。

付超教授擅长从均衡视角研究政策相关问题，其研究主题涵盖了教育、城市政策、劳动力培训、灾后再分配和健康保险系统。付超教授的文章发表在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Econometrica,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等经济学顶级期刊上。

劳动力市场效率依赖于恰当的工资分配机制，而现实中大量劳动力受雇于生产效率和工资并不紧密挂钩的市场，例如教师市场。公立学校的教师工资严格遵循集体谈判确定的工资，被称之为固定薪酬制度（rigid-pay regime）。另一种安排为弹性工资制度（flexible-pay regime）——学区可以灵活地设计他们自己的教师工资。有些老师更擅长激励成绩优异的学生，而另一些老师则更擅长帮助成绩较差的学生。因此，根据教师的比较优势对学生进行分类教学理论上是最有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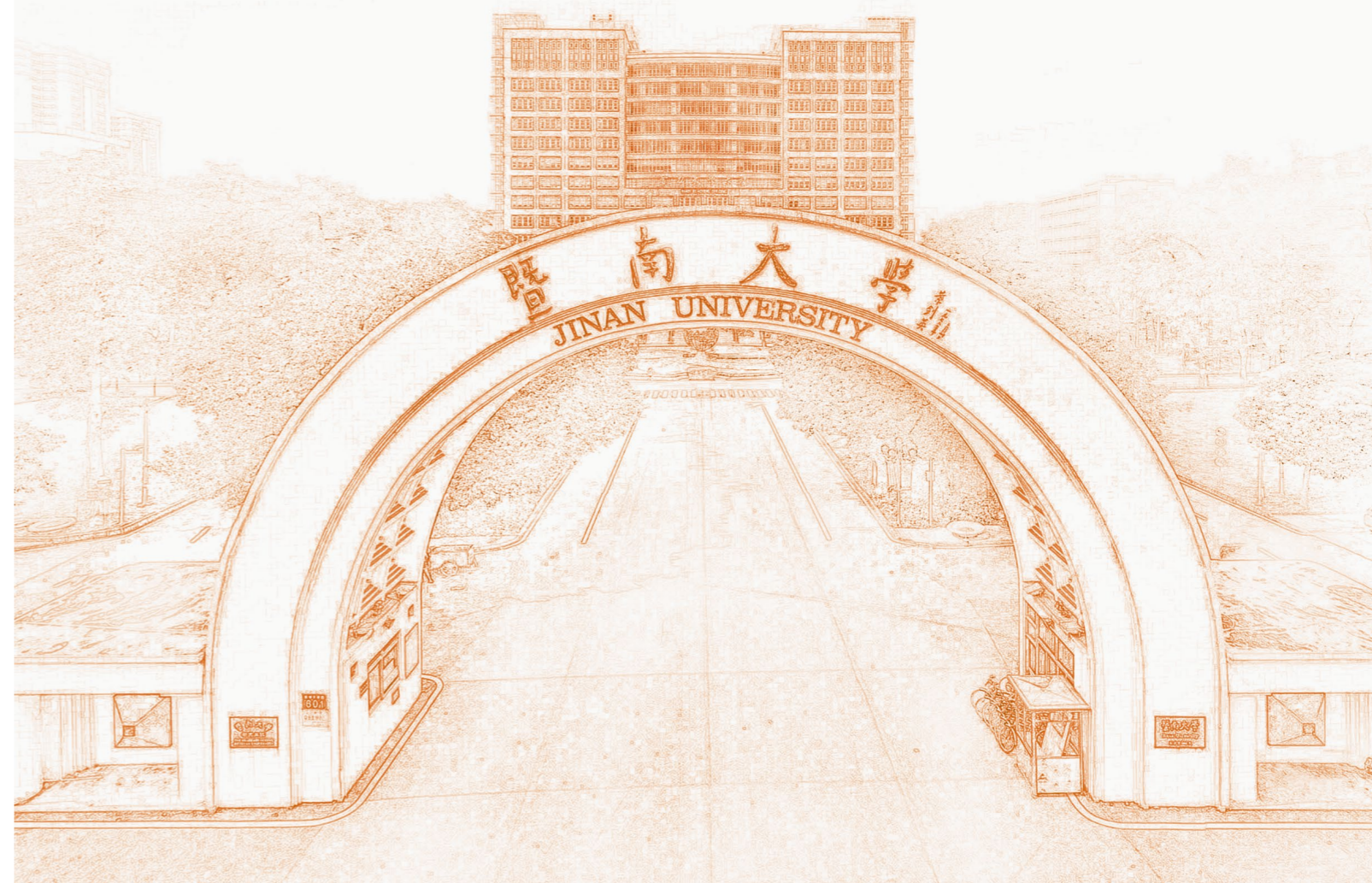
美国教师工资安排缺乏灵活性和变化。州内的教师工资通常是由教师工会议价确定的，该州的所有学区通常都被强加了非常相似和严格的工资标准，这使得人们很难推断出各学区的偏好。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例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更多情况的机会：2011年，威斯康星州通过了一项名为第10号法案的法律，该法案终止了教师工资的集体谈判，并赋予各学区对教师工资的完全自主权。因此作者使用威斯康辛州的数据来估算本文模型。

作者构造了一个公立学校教师市场的均衡模型，模型内学区的目标是在预算约束内通过制定工资标准和提供工作机会来填补其教师空缺，而教师则在所有收到的offer中选择他们最喜欢的地区。均衡要求所有学区和教师的决定一致。主要的识别障碍是研究人员只能观察到被接受的offer，使得很难区分教师偏好和学区偏好。解决方案是通过构造辅助模型间接推断主模型。通过观察作者可以推断出每个教师必须面对的可行选项的子集，进一步了解教师的偏好。最后，作者进一步探索了提高教育效率和公平的反事实政策。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让学区控制教师的薪酬会导致更有效的学区划分，但会导致更大的教育不平等。但这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精心设计的干预措施可以兼顾公平和效率。在灵活的薪酬条件下，教师奖金计划鼓励基于比较优势的排序，再加上其有利于成绩较差、学生较多的学区，因此可以同时提高效率和公平。

在此次讲座中，付超教授与参会人员积极互动，针对参会老师的问题做了简洁明确的解答，使参会人员更好地理解了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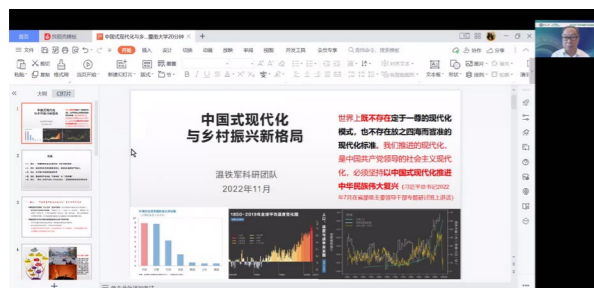
思想 聚焦



2022年广东乡村振兴高端论坛专题

主旨演讲

温铁军：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新格局



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新格局，首先，温铁军教授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和“以人为本”的乡村振兴同步，既需要“物质、精神”双文明，又需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实现巨大人口规模的共同富裕。温教授从农业 1.0 到农业 4.0 的演进过程，以及全球化与生态文明对农业区域格局演变的影响总结提出，综合化、社会化和生态化才是符合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内涵要求的乡村振兴发展方向。

其次，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推动空间生态资源要素的价值化。温教授介绍，中国的金融总量在不断增加，同时积累了巨额的实体资产，可通过第一次分配来奠定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形成达到共同富裕的财产基础。接下来，在空间生态资源要素的价值化过程中，需要发展新型县域经济，坚持县乡村三级统筹规划，把产业留在县域，让农民分享产业收益。同时，要持续推进深改，调整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生产关系，即县域经济产业化的“三级市场”与“三变改革”。在此，温教授着重介绍了四川省德阳市首创的闲置农房流转“三书模式”，这为二级市场的农村资产平滑交易和广泛推开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最后，温铁军教授总结提出，“生态产业化和产业

生态化”的新格局需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系。新型市场经济针对的问题是如何统筹两化、两供和三变，即“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要同农业和金融两大供给侧改革相结合，并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和村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以此作为微观基础共同推进新型县域经济，进而使乡村振兴战略成为生态资本深化的新经济领域。

钟甫宁：人口变迁与乡村治理——村民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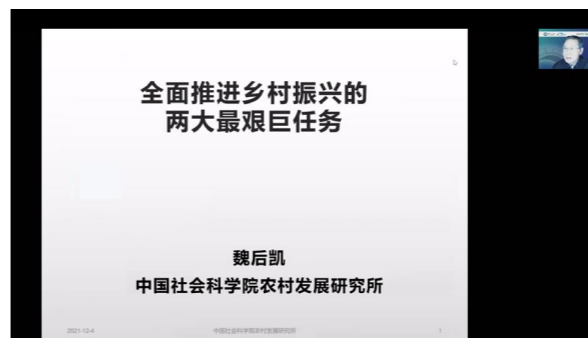
钟甫宁教授以组织振兴为背景，指出农村基层组织对于挖掘我国制度优势的潜力具有重要作用，但新时代面临的巨大挑战是人和土地问题。首先，在乡村自治组织的研究上，钟甫宁教授指出，当前我国的乡村自治组织具有“政社不完全分离”的特点，在此情况下，乡村自治组织主要面临三方面的挑战：一是村民自治组织具有管理集体经济项目的经济职能；二是户籍在本村却不在本村居住和户籍不在本村的自治组织成员资格的界定；三是自治组织成员权利的界定。面对这些问题，钟甫宁教授指出更合理的办法是要尽快成立集体经济组织，实现政社彻底分离。

其次，在集体经济组织的研究上，钟甫宁教授认为，集体经济组织和土地制度相关联，因此在分析集体经济组织时也需要分析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目前我国实行“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即所有权、土地承包经

营权和土地经营权分置。该土地制度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宪法只规定了农村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但是没有对所有权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进行明确的界定。

基于以上挑战和问题，钟甫宁教授提出了完善农村基层组织的几点思路：第一，政治权、居民权与经济权、收益权应当分开，农村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关系也应当有所调整；第二，村民自治组织三类成员的权利应当有所区分，三类成员享受同等基本公共服务，但由集体经济组织收益提供的服务改为计费或收费的模式；第三，参考华为模式，将所有权与收益权分开，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共有、不可分的基础上量化分配土地收益。最后，钟甫宁教授建议可以参考已有的地方法规，通过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先行试点的方式，为全国探索振兴乡村的制度建设道路。

魏后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两大最艰巨任务



魏后凯教授提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两大最艰巨任务。

首先，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方面，魏后凯教授指出，党的 20 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将农业强国建设纳入我国强国战略体系，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和新阶段。随后，魏后凯教授介绍了“四强一高”的农业强国定义，即农业供给保障能力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农业竞争能力强、农业发展水平高。

魏后凯教授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意义重大，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经之路和重点难点所

在，要正确处理好农业强国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具体而言，农业强国与农业现代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从联系看，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强国建设的基础和前提，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并不一定意味着农业强国的建成；同时，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会进一步促进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从区别看，二者在内涵、范围和着眼点上都是不同的。

魏后凯教授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需要建成的农业强国，将是农林牧渔业及相关产业高质量全面协调发展的综合型农业强国。而建设这种综合型农业强国，难度更大，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要分阶段、分产业稳步推进；要重视固底板、补短板 and 破瓶颈；要加强组织领导和政策支持。

其次，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方面，魏后凯教授认为，和美乡村是美丽乡村的升级版，和美乡村，既要美，更要和，是和美与共的有机统一，要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和美新乡村，突出乡村个性和特色，强调支持导向和负面清单相结合。

刘守英：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首先，刘守英教授通过美国城乡融合的案例，总结国外城乡融合和城市转型的规律和特征。城乡融合是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城乡形态，其主要特征包括：一是人口向郊区和乡村流动，形成都市区（中心城市、郊区）和非都市区（乡村和小城镇）共存的空间格局；二是随着大都市区内产业链的形成，城乡经济相互依存；三是城乡产业结构差异减少，乡村产业非农化、产业结构多样化趋势明显；四是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减少，既体现在中心城区与郊区的收入差距扭转，也体现在都市区和非都市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减少。

我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等拉美国家的城市化存在显著

差异。刘守英教授接着重点分析我国快速城市化下的城乡格局，其认为中国和美国快速城市化的最大不同在于我国的快速城市化并未导致类似美国一样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而是导致了更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此外，我国的城乡融合也存在外出人口回乡比例高、农业竞争力下降、以及乡村在“人”“业”“住”“地”等方面功能失衡的特征和问题。

实现我国从城乡二分到城乡融合的发展，刘守英教授认为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摒弃或单向城市化或乡村建设的两极思维；二是要发挥都市圈、大城市郊

区与城市区、县城及其延伸区等城乡融合区域作为空间载体的作用；三是要实现财商融合，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进行以土地为核心的要素配置改革，例如建立统一的土地权利体系和土地市场。在实现乡村振兴方面，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乡村产业振兴的办法，实现农业工业化。既要实现农业劳动力和农业产值两个份额的同步，也要通过重组和升级农业各种生产要素，实现更好的匹配，并提高单位土地回报率。通过实现农业工业化和土地配置的重构，发展乡村产业和经济，吸引更多人才回到乡村和建设乡村，最后形成村落的新形态。

圆桌论坛一：如何打造现代化农业强国

程国强：农业强国建设的逻辑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委员程国强首先从农业强国建设政策考量视角，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提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在20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农业强国建设。从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看来，农业强国是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递进，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强国的前提和基础，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落脚点。

程国强教授认为，农业强国建设的基本逻辑是要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从农业现代化向农业强国迈进。中国农业目前具有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阶段特征。他从农业强国建设的国际视角，以玉米产业链、农业和涉农产业价值链增值率、就业占比等指标，剖析了美国农业大而强且优的样本特征。他进一步认为，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强国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范围以及目标，相对于先行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共同规律和不同路径而言，中国农业现代化在经营基础结构、资源禀赋上面临更加严酷的条件和严峻挑战。

最后，程国强教授指出农业强国建设的基本内涵包括供给能力强、科技创新能力强、经营主体强、国际竞争力强、综合效益高；农业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包括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周应恒：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强国路径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委员周应恒以二十大提出的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为背景，以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认识与框架为基础，着重分析了日本的农业现代化的模式与经验，并针对中国的国情条件、农情特点及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要求，最后提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强国路径。

周应恒教授指出，可以从特征和成效两个维度认识农业现代化，一方面，农业现代化的特征包括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强、农业物质装备水平高、农业发展理念新、农业经营组织化、农业产业体系韧性高等；另一方面，农业现代化的成效要求在要素维度聚焦生产率、在产品维度聚焦商品化率及附加值高、在产业维度聚焦竞争力和在发展维度聚焦可持续性。总之，农业现代化发展要与本国的资源禀赋、文化传统、经济社会体制机制、发展阶段相协调相适应，应着眼于满足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周应恒教授着重分析日本的农业现代化模式与经验，指出日本模式开创了小农体系的现代化路径。日本的农业现代化具有五个特征：科技现代化、物质装备现代化、经营者现代化、经营组织现代化和产业结构现代化。不仅如此，日本模式具有“三高二强”的成效：农业要素生产率高、农产品商品化率高、农产品附加值高、农业产业差异化竞争势头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

在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处于大国小农、城乡失衡的状况，而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条件、路径、模式不同，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及荷兰与以色列的特色

农业现代化模式，可以提供我们更多的借鉴。中国总体上不能单纯追求欧美模式的土地规模竞争，要结合中国农耕文明传统优势，发挥中国农业的差异化竞争优势，走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路径，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径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特产化、绿色化、高附加值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周应恒教授提到，未来中国小农格局还将长期存在，农业经营主体应会进一步分化，呈多元化格局，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与农村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最后，周应恒教授提出中国农业强国的建设路径：一是要进一步推动新型城镇化，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二是要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要依靠改革深化，激发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四是要以大食物观，优化食物生产布局，改善我国食物供应结构；五是要以大资源观，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破除农业资源禀赋约束；六是要强化全民“食育”，引导消费需求并调整供给结构；七是要构建特色优势产业，提升农业竞争力。

仇焕广：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委员仇焕广教授以二十大报告提到的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背景，分别从供给侧、需求侧、国际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分享对夯实粮食安全的几点思考。

首先，在供给侧的改革中，仇焕广教授指出，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持续下降，总体来看中国粮食进口量呈增加趋势，出口量呈下降趋势，我国目前每年新增的粮食缺口接近于1000万吨。因此，仇焕广教授强调，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种业和装备技术、提升

地力、提升栽培和绿色防控技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式抵消缺口。但是这其中的种业科技研发“两张皮”问题、种业振兴问题仍有待解决。

其次，在需求侧夯实粮食安全方面，仇焕广教授提到，中国居民饮食存在数量和结构不合理现象，若能够对消费和食物结构进行调整，将有利于缓解供给端压力，优化农业供给侧改革；促进资源有效利用，保障生态可持续发展；减少食物损失和浪费。要引导消费者消费行为转变，将减少食物浪费落到实处，或许可以考虑在消费端征收较高消费税，以税收收入给低消费群体、中小学营养午餐给予营养券补贴，或是通过需求侧改革与电商的结合发展，带动供给侧改革。

接着，在国际合作夯实粮食安全方面，仇焕广教授指出，中国农业对外合作存在四个问题，一是农业部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数量呈下降趋势；二是投资环节有待优化；三是投资产业附加值低；四是投资区域集中，这些问题以及种业是否开放和转基因技术是否采用等问题都影响着粮食安全。

最后，在可持续发展夯实粮食安全方面，仇焕广教授强调，在保障粮食安全的过程中也要注重生态安全，破坏生态不仅不能保障粮食安全，反而会在长期会威胁粮食安全。同时，地方政策的左右摇摆容易挫伤生产者投资农业的积极性。在可持续发展中，需要进一步思考粮食安全到底是数量安全还是能力安全。

圆桌讨论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副教授钱龙：在粮食安全转向大食物观的背景下，大食物观的提出和农业强国建设的关联？

程国强：大食物观的提出是符合国家发展阶段的要求的。根据食物结构消费的基本规律——班尼特规律，随着收入增加，食物结构会逐渐升级，人们对营养丰富的肉类、蔬菜、水果的消费会大幅增加。2021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2000美元，十四五期间，国民收入将跨入高收入阶段，食物消费结构也要作出相应调整，跨入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在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的同时，还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多种食物的消费需求。大食物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食物结构的升级要求农业供给体系要满足现在多层次、多方面、多元化的消费需要。农业强国的提出符合国家现阶段发展情况以及今后30年建设的总体布局要求，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基础与标配，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多种食物的多元化消费需求，是农业强国建设的基本任务。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副教授钱龙：中国式农业化道路最大的显性特征是什么？日本“食育”能为我们提供哪些方面的参考？

周应恒：中国式现代化强国的显性特征包括：充分发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农耕文明传统、充分利用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来提升食物供给保障水平；建立精致精细的高附加值、有特殊魅力和竞争力的特色农业产业；传承独特的优秀中华饮食文化，建立营养健康的饮食习惯，形成丰富多彩的饮食结构；依托强大的农业和食物系统，提升国际竞争力。值得借鉴日本“食育”的经验主要是从娃娃抓起的全民“食育”教育体系。在义务教育阶段，日本由政府提供免费中餐食物配给，每个学校建有食堂，配备有营养师，并结合课程与饮食进行“食育”的宣传教育，培养儿童对民族饮食文化的自豪感、认同感和营养健康饮食观念，安排每周限一次的外来饮食风味体验，介绍民族饮食的特点与优点，限制外来饮食文化的过度渗透。在社会饮食产业的管理方面，除了宣传健康饮食的知识外，日本对大型的餐饮企业或供餐组织，要求对每份食物的能量、宏量元素的成分乃至色素都会为消费

者提供成分含量信息，促进食物营养搭配及健康消费。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副教授钱龙：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的具体根基是什么？从结构来看，我国粮食浪费主要以原粮居多，进口主要以高蛋白、高层次的食物为主，如何缩小进出口之间“量”和“质”上的缺口？

仇焕广：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的具体根基是生产能力，而非过度强调生产数量。生态安全能为长期粮食安全提供保障，资源要素的有效利用、耕地质量提升（提升土地有机质含量）、科技进步（种业振兴）等都是生产能力的重要体现。在食物浪费问题上，按重量划分，蔬菜、肉类和粮食是食物浪费的三大类别，但折算成土地资源或各类要素投入，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崔潇濛：农业领域有很多像南水北调工程之类的政府主导的、科技含量很高的基础设施投入，能够促进资源要素的利用与优化，是否能围绕这些独特优势探索中国特色农业发展路径？中国有很完整的种子研发科研体系和科研网络，是不是没有很好的机制对此加以利用？

程国强：中国存在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独特优势和特征，虽然农业发展存在大国小农格局和人多地少水更少的资源禀赋这两大劣势，但可以围绕以上特征进行经营制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技进步与创新来改善现状，弥补先天的不足之处。中国自身的独特优势有以下三点：一是中国特殊的制度优势，例如保障粮食安全上的党政同责；二是注重提升地方和农民的积极性；三是作为现代农业基础支撑的公众产品的提供，包括大规模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南水北调工程等。

周应恒：中国有些方面的劣势也伴随着优势：虽然人均农业资源禀赋较低，但我们有资源禀赋上的总量与类别丰富的优势，包括各种的广袤多样的国土资源、气候资源和丰富的生物物种资源等。以及悠久的农耕文明和内行大食物观的饮食文化，随着技术进步，我们可以将劣势转化为优势，促进资源的开发利用。另外，体制优势上公共物品的提供不仅仅有南水北调工程，还有集

体化时期通过劳动积累建成的各种水库、特色的集体所有制、庞大的教育科研机构，但教育科研机构大而不强，存在一定的市场衔接不强、行政化色彩浓厚等问题，需要进一步革新与突破。

仇焕广：市场化改革以后，农机推广人员的工作有一定改变，基层农机推广人员的工作年龄和知识结构老化，很多人员的主要工作也不再是农业科技的推广，现在农业科技的研发和推广主体是科研院所和高校，再有就是省级、地市级的农科院，虽然后者的基础研发能力有所弱化，但推广与大田育种整体优势犹在。农业种业发展的重点在于将前端的生物技术育种工作与省级、地市级的科研人员所负责的基础的大田育种工作相结合，但问题在于前端的技术育种力量比较零散，不够集中，现代种业企业无法承担前端的育种工作。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增强体制的灵活性，由国有企业和公共科研部门承担相关功能；要允许国外大企业进入中

圆桌论坛二：建设和谐富美乡村

汪三贵：脱贫地区脱贫户收入变化及增收策略



2020年底，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绝对贫困历史性地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有效解决。接下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成为工作重点。

首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指出，了解脱贫户收入变化情况，促进脱贫户和其他低收入农户收入持续增长是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核心任务。脱贫攻坚后，部分脱贫人口生计脆弱性较强，抗风险能力有限，存在返贫的可能与风险。因此，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在中部和西部两个省区22801户脱贫户的样本数据，汪三贵教授分析了2020-2021年脱贫户的收入水平、结构变化和内部差距，为下一阶段促进脱贫户增收、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帮扶政策优化与调整提供参考依据。

随后，数据结果表明，贫困户人均收入有所增长，但增速不高。特别是在巩固阶段，脱贫户收入保持增长的同时，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扩大，这表明，相对贫困现象将长期存在，部分脱贫户的相对收入水平具有不稳定性。从不同组别贫困户的收入结构来看，工资性收入是脱贫户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是不同收入组别脱贫户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

最后，汪三贵教授提出三点政策建议，一是持续巩固脱贫人口特别是低收入人口的持续增收机制，确保收入持续增加，且与其他群体收入差距逐步缩小。二是针对脱贫户的帮扶政策体系，在过渡期内实现合理把握调整节奏和力度，遵循“差别对待，动态调整”原则。三是坚持因户施策，杜绝“应帮未帮”现象，强化以能力提升为导向的帮扶措施。

李实：提高农民收入，缓解相对贫困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农民收入增长趋势，二是农村低收入人群与相对贫困，三是提高农民收入需要制度创新。

首先，数据表明，1979年到2020年，农民收入的实际年均增长率约为6.8%整体农民收入增长比较缓慢。其中改革开放时期，农民收入的实际年均增长率比较高，达到10%甚至15%；而80年代中期到2006年，农民收入的实际年均增长率比较缓慢；2007年之后，农民的收入增长又进入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原因包括农业税费减免、农民低保制度的建立和粮农补贴等。

随后，李实教授提出，我国富裕程度仍然不高，当前低收入群体比例较高，低收入人群规模较大。2021年，我国低收入群体占比为65.67%，约为9.3亿人。从分布来看，低收入人群有40%分布在城镇地区，52%分布在

农村地区，8%属于流动人口。从城乡来看，城镇地区的低收入人群占比为57%，农村地区的低收入人群占比高达95%。另外，低收入人群中收入更低的一部分为相对贫困人口，相对贫困人口89%分布在农村，9%分布在城镇。

最后，为缓解相对贫困，提高低收入农民的收入，李实教授提出三大政策体系：一是现阶段加大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赋能），主要包括：加大对农村教育投资，例如学前教育，营养补贴，免费医疗和教师补贴，缩小城乡教育机会差别；建立劳动力的终身学习培训制度，对农民工给以培训补贴。二是给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多创收机会和条件（平权），主要包括：就业优先政策，消除户籍、教育机会及其它就业歧视性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金融对农村创业就业的支持力度，改革农村的土地制度。三是瞄准农村的相对贫困人口，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善行），主要包括：实施长期缓解相对贫困的发展战略，提高农村低保救助的覆盖面和救助水平，大幅度提高农村养老保障待遇水平和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质量，提高农村大病救助的力度；坚持廉租房政策，促进慈善事业发展，建立先富带后富的机制。

郭红东：建设数字乡村 助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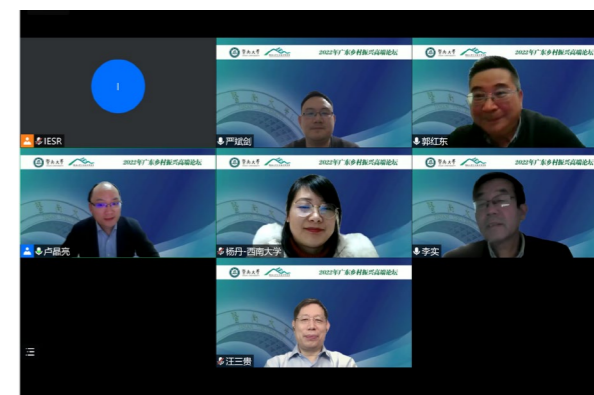
首先，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郭红东从政策角度阐述了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性。政策指出，到2025年，数字乡村建设将取得重要进展，城乡“数字鸿沟”大幅缩小，农民数字化素养显著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全面建成数字乡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随后，郭红东教授指出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基本路径，即从顶层设计到试点探索，再到经验总结，从理论提升到形成统一化框架与标准，再到全面推广。根据国家七部委联合发布的《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数字乡村建设具体包括信息技术设施、公共支撑平台、数字应用场景建设、运营管理和保障体系建设等内容。

接下来，郭红东教授分享了浙江数字乡村建设的典型案例，并通过案例指出数字乡村建设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系统好看实用，二是系统好看不好用，三是重视建设轻运营。那么，数字乡村建设需要研究哪些问题呢？郭红东教授指出，数字乡村建设需要建设什么？靠谁来建设？靠谁来运营？钱从哪里来？数据如何整合与共享主体如何协商？如何吸引农民参与？如何可持续发展？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真正实现数字乡村。

最后，郭红东教授对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提出了五点对策思路。一是优先选择契合本地区发展优势的应用场景；二是进一步明晰省、县、镇、村不同层级之间的权责范围；三是注重打造多元共建的发展格局；四是注重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建设运营模式；五是注重基础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

圆桌讨论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严斌剑教授：目前国家已经给出乡村振兴的二十字目标，那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乡村振兴有没有一个系统的框架？实现共同富裕，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实现公平，我们国家主要还是问题导向，有没有一个好的理念进行指导？对于低收入群体，我们有一个底线思维，这个底线思维能不能和机会平等融入在一起？

李实：在理论上，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都是很重要的，我们既需要机会公平也需要结果公平。但在现实背景下，这一问题会变的更加复杂，因为现实已经出现了机会的不平等，也出现了结果的不平等，机会的不平等会进一步造成结果不平等，而在结果不平等条件下也很难实现机会公平。因此，我们要明晰造成不平等的主因，然后对症下药。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双管齐下，既要解决结果不平等，还要促进到机会平等。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杨丹教授：脱贫户的收入增加了，但收入差距还是很大的，这说明低收入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还是比较低，并且，低收入群体主要积聚在农民中，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关注农村的低收入人群。目前，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比比较高，农业收入占比很少，加上疫情影响，外出务工的时间也少了，在这一现实基础上，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个体、群体和区域三个层级来考虑。从个体来看，个体要从敢不敢，能不能这三个方面来提升自身发展能力。从群体来讲，主要是通过精英引领，利益共享的逻辑，从整体上提升群体的发展能力。从区域来看，区域如何挖掘本地的资源，提升资源整合的能力，最终使得本地的产业得到发展。另外，我们还应该关注一下福利依赖和福利悬崖的问题，因为我国的福利政策在未来五年依旧会保持，那么，五年之后将会怎么办？

汪三贵：要想真正实现脱贫致富，必须要发展内生动力，但是内生动力是一个由多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上升到了文化层面上。从现实来看，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往往是偏远地区的群体，特别是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很多问题需要跨代解决，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才能得以解决。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移民搬迁，将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们搬迁到城镇，其中涉及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而人们能否适应成为了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靠自身发展产业，提高生活质量。其中通过合作社或集体经济将人们组织起来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但如何使这种合作社得以稳定，如何通过新型的集体经济使低收入人群受益，我们还需要探索。

郭红东：脱贫的问题或者是发展的问题，我个人看来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能力的贫困，一个是机会的贫困。特别是西部很多地区不适合发展产业，大多都是通过移民搬迁来解决贫困问题，这是一条路径。另外一种情况是当地资源比较充沛，具有特色产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区域的配套，通过政府政策的扶持，给老百姓提供创业的机会。目前，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构建一个地区产业发展能力支撑体系。

圆桌论坛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

谭淑豪：创新经营制度，促进集体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谭淑豪首先提出了“一个观点、一个判断、一个建议”，即乡村振兴需要依赖当地人来进行，土地经营制度不合理是乡村振兴面临挑战的关键所在，要谨慎土地向外来资本的大规模流转。

谭淑豪教授认为，土地问题使乡村的产业和生态振兴面临挑战。现有产权制度下单家独户小规模细碎化的土地经营，会造成农业系统的生态功能弱化，农田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力，气候变化应对能力不强以及农产品价值链薄弱等问题。当前，国内和国际上已制定了一系列绿色发展战略与目标，为我国农业生产转型升级带来良好机遇，农业生产从集约向生态友好型转型成为必然，也成为促进产业乡村振兴和生态振兴的重要途径。

关于如何推动农业生产从集约向生态友好型转型，谭淑豪教授认为关键在于创新土地经营制度，促进集体行动，从而助力乡村产业和生态振兴。随后，谭淑豪教授分享了一个草原牧区创新土地经营制度的成功案例，该案例研究发现，与单户利用相比，集体行动节约了牧民用于放牧的时间，降低了草地系统的牲畜放牧压力，使草地走向良性治理，采取集体行动共用草地带来的正向

效果又进一步维系了集体行动。借鉴该案例的成功经验，谭淑豪教授提出了农村地区创新土地经营制度的一些构想：一是让具有集体成员权的每一个村民都有权享有土地份额，二是将本村土地的利用权和发展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三是增强统分结合中的“统”，在自然村层面或村民小组层面进行“统”，创新自然村层面的集体经营制度。

黄少安：如何认识现代化背景下的征地补偿和农房改造？



现代化过程实质上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是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和伟大的社会进步。山东大学讲席教授、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将与“三农”高度相关的转型概括为三个“大量”：大量土地改变用途、大量人口离开农村和农业、大量村庄凋敝空置。关于如何认识大转型的“三农问题”，黄少安教授提到了以下三点。

一是征地是否要补偿？补多少？高补还是低补？从理论上讲，征地可补可不补。例如，征用一定公有范围内的土地为同样公有范围内的居民提供公共产品，就没有必要补偿，或者当征地补偿额占土地所有者的总收入比例很低，可以忽略不计或不在乎时，被征地者可能放弃补偿，以获取更好的名声。当然，由于中国人多地少，多数农户的土地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不低，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是需要补偿的。

二是中国农民是否做贡献了？是否吃亏了？如果高社会会怎么样？如果与假定或模拟的市场价格相比，农民实际获得的补偿价格确实很低，农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民也获得了更加巨大的增加收入和融入现代化的机会。黄少安教授团队多年的实地调查发现，几乎所有被征地的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都有较大幅度提高。如果高补或按照所谓市场价格补，一方面从财政收入来看是不具可行性的，另一方面也会使城市化和工业化大幅减速，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机会相应减少，收入不会增加，土地不会升值。

三是如何认识实践中的撤村并居和农房改造。这实际上是中国式的就地城镇化。黄少安教授认为，首先，在明确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目标时，要把整合优化宅基地、农民宅基地资本化和财富效应、提高农民居民生活质量这三个目标整合起来。其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正常的，只能通过发展解决，包括如何兼顾少数老龄人与多数年轻人的利益和观念，如何处理短期不适和长期利益，如何分清楚个别问题和普遍现象等问题。第三，在实践中要理性认识农民和基层干部行为，不能低估农民的理性和智慧，也不要妖魔化基层干部。最后，也要与时俱进地看待媒体和专家的言论，有些言论实际上并不符合农民的真实需求，有些言论也早已过时。

罗必良：共同富裕的资产逻辑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其中城乡收入差距是一个标志性问题。华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罗必良认为，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资产或财富积累的差异。事实上，中国农村有着丰裕的资产，但这些资产缺乏有效的盘活机制，无法有效提升农民的收入，使其摆脱贫困。

接着，罗必良教授从产权角度进行理论分析。产权通常分为私有产权（排他）、公共产权（共有）和俱乐部产权（对外排他、内部共有）三种类型。由于个体行为能力的差异性和资源价值属性的多重性和关联性，公有产权容易导致低效率，导致“公地悲剧”，而私有产权则容易导致不公平，能力越强者，在竞争中越具有优势，进而导致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

罗必良教授进一步指出，具有集体产权性质的农村生态资产（土地、景观、人文生态）既可通过市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价值实现，同时又不至于带来贫富分化并实现共同富裕。具体而言，具有集体产权性质的农村生态资产满足以下的六大条件：在产权界定上具有“不可分性”、在空间配置上具有不可移动性、在资源利用上具有产权的排他性、在市场需求上具有市场容量的扩展性、在收益分配上具有成员的共享性，并且从长期增长而言不会出现“伊斯特林悖论”。

最后，罗必良教授从实证分析角度验证了农村集体经济对农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并给出了具体的操作策略：一是以村庄集体所有制为前提，以农户家庭发展账户为基础，以农户自愿自主组建村社股份合作社，由此推进农村集体资产，尤其是生态资产的规模化、组织化、专业化与市场化运营；二是重点发育农村资本市场和生态资产的衍生品市场与功能性服务市场；三则是鼓励并促进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市场的竞争性进入，由此让农民在资产资本化的过程中分享共同富裕的红利。

圆桌讨论



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谢宝剑：首先是关于谭教授提到的村民集体行动的问题。在

实地调研中，我们也发现那些产业发展比较好或是集体经济收入比较多的村往往是那些权属确定得没那么明确、集体行动比较好的村。土地权属割裂问题以及个人利益问题是导致集体行动困难的两个主要原因。当集体项目收益没那么快获得时，要维持集体行动便要依靠创新的土地经营制度。因此谭教授提到牧场分工的案例，我非常认同。另外，谭教授也提到了村民集体行动相关的利用权、发展权和话语权的问题，还有怎么进行“统”和“分”协调联动的问题。我也认同自然村层面的、村民小组层面的“统”，权属过细很可能导致非常大的社会成本。黄少安教授谈到的“征地补偿”和“农房改造”问题，我也是非常认同。在中国式的城镇化过程当中，关键是要把征地补偿如何用在村民共享、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上，让农民有成就感和获得感。罗必良教授讲的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感同身受的。共同富裕最核心的就是产权问题，以产权的方式来增加农民的获得感，我觉得罗教授的分析非常好。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仇童伟：乡村振兴和国家之前一直在做的粮食安全、集体资产等相关领域有何区别和联系？将大量资金投向乡村，往哪里投，如何投，经济效益会怎么样？谭教授的例子是牧区，是否具有向农区推广的普遍性？在乡村实践中，收回已经下放的权力是否会有困难？与罗老师观点有区别的是，我们是不是非得排斥资本下乡？在农村人口流失的现状下，乡村振兴本地化是否可取？黄老师说我们征地补偿补不了太多，但我觉得应不应该补和有没有能力补是两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补，但不应该补那么多。考虑到农村资产的收益和折旧，向农村投钱和盘活存量资产要相互结合。另外，罗老师的实证对地区的情景依赖比较强，会不会只有在东部发达地区能做的比较好，出现盘活集体经济的“马太效应”？

谭淑豪：我分享的案例是牧区的案例，肯定不能简单地推广到农区，因为牧业和农业的业态不同，草地和农地的资源属性也不完全一样，但农区和牧区的土地经营制度一样，都以单家独户经营为主，这种单户经营带来的问题也很相似。案例中牧区经营制度的创新可以被农区借鉴。下放的权力（即已经承包到户的土地）如何收回，这确实是个问题，可能需要在什么时间节点上考

虑创新，这是我们作为学者的构想，具体操作还得再考虑。我并不完全排斥大资本，但尽量不要让大资本主导农村土地的发展权。巴西的案例是个教训。

黄少安：在征地补偿应不应该补的问题上，我认为应该补，但是否应该向外宣传，我认为这涉及到学术伦理问题。此外，我在一定程度上赞同其他两位学者关于发展集体经济的观点，但发展集体经济是否能真的促进共同富裕，还是存在其他原因？我认为，乡村振兴应该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不要忘了农村，而不是逆工业化、逆城市化而动。

罗必良：盘活集体资产是我的主线，发展集体经济是我的佐证。发展集体经济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其前提是必须盘活集体资产。我一直都不认为发展集体经济有其必然性，也不存在长期可能性，作为短期的阶段性策略会更可行。资产的盘活永远是最重要的，但集体资产不是由集体本身去盘活，我强调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的运作必须有效界定剩余控制权或剩余索取权，所以要建立集体资产背景下的账户。另外，西部地区的资产盘活也有空间，当人口流出后其生态资产价值会提升。农村资产有多重价值属性，一种价值下降，别的价值可能会上升，我们要开发多样化农村生态产品。我认为从研究者的角度，一是需要迂回的思维，提出方案能让决策者接受，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长期学术目标的实现。

暨济一堂 - 乡村振兴大讲堂

武拉平：

中国农业市场化改革之路：理论思考与中国模式



2022年9月29日，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武拉平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农业市场化改革之路：理论思考与中国模式”主题讲座。首先，武教授回顾了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然后从农业市场化改革的逻辑、模式及其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农业市场的发展进行了展望，认为农产品市场正在经历六大转变。

从宏观经济体制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内主要是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对外则是由封闭走向开放。1978年以前，我国是计划经济体制，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各领域的经济活动均由政府按照计划安排。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政府逐步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调动农户和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984年，政府明确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始从“计划”向“市场”过渡，这一阶段计划与市场“双轨”共存，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市场，既有政府的计划收购，又有自由市场收购。1992年，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总体来看，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由原来的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到计划与市场双轨共存，再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这一改革过程大大促进了我国的经济腾飞。

从改革的特点和逻辑来看，武拉平教授指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渐进式的。我国经历了从消费品市场到生产资料市场再到要素市场的改革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时代，国内的市场化改革依然是坚定不移的方向，同时改革的重点实现了从需求侧向供给侧的转变，明确了供给侧改革的方向。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生产，生产的核心是技术。目前的改革就是要把中国经济的增长从依靠传统的土地、劳力和资本三要素转变为依靠现代技术、信息（数据）和管理新型三要素上来，从而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农业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来看，武拉平教授认为，理论上就是要基于“完全竞争”的理论，建立充分竞争的农业市场，生产经营活动都将主要依靠市场调节；从实践上来说，改革过程中也必须以处理好“三农”问题为重要目标。对于“农业”问题，主要是抓好生产，保证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对于“农村”问题，主要是促进发展，建设和谐美丽乡村；对于“农民”问题，主要是抓好增收，实现共同富裕。

从农业市场化改革的模式来看，武拉平教授总结为五个方面：在市场主体方面，培育了无数的、充分竞争的多元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市场客体方面，实现了丰富的、标准化和品牌化的农产品供给；在市场信息方面，提供了充分、及时的现代化信息；从行业进出角度来看，实现了自由、宽松的行业和市场进出；在市场体系和制度方面，建成了完善的、现代化的市场体系和运行制度。与国外相比，我国的农业市场化模式具有中国特色：一是我国的农业市场并非单一的市场化，而是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二是中国的土地实行“三权分置”，农村土地（耕地）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对实际使

用者，农户的土地承包权可以自由流转；三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农产品等核心物资实行“准商品化”，包括粮食和土地等，政府对市场进行一定的调控。

最后，武拉平教授对我国农业市场的发展进行了展望。他指出，我国农业市场发展经历了快速发展（1978-1984）、稳步推进（1985-1992）、巩固调整（1993-2000）的阶段后，2001年加入WTO之后，农业市场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2015年以来，网上销售成为市场化的新趋势，商品和服务的线上交易呈现快速增长。总体来看，我国农产品市场正在经历六大转变：一是从关注产品市场转变为关注要素市场，技术和信息等新型要素的重要

性日益凸显；二是从以现货市场为主，逐步转变为现货和期货市场并重。在推动现货收购、批发和零售发展的同时，期货市场更快地发展起来，近年来鸡蛋、生猪、苹果和红枣等品种期货纷纷推出；三是从线下市场为主转变为线上线下相结合；四是从传统的多环节交易转变为利用信息技术实现产销对接；五是从商品流为主转变为更加关注信息流；六则是从关注表面的现象问题转变为更加关注市场本质。武拉平教授还指出，未来新型要素对农业市场的影响，期货市场如何服务三农，农户的信息素养、农产品的线上交易等诸多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谢治菊：东西部协作与乡村振兴



2022年10月31日，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谢治菊教授做客暨南大学乡村振兴大讲堂第23讲。谢治菊教授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论述入手，作了题为“东西部协作与乡村振兴”的主题讲座。本次讲座参会人数达160余人，讲座由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助理李承政主持。

讲座中，谢治菊教授首先介绍了东西部协作助推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她指出，东西部协作始于1980年代初邓小平的“两个大局”伟大构想，其前身是1996年的对口帮扶。2016年，习近平在银川召开了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这项工作从倡导性制度转变为规范性制度。2017年8月印发《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办法（试行）》后，

扶贫协作工作由“软约束”转变为“硬约束”，正式走向制度化与规范化。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东西部扶贫协作”改为“东西部协作”，并明确指出“十四五”期间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

谈及东西部协作政策扩散的特点，谢治菊教授指出，从空间维度看，辐射扩散与跨域扩散并重，结对空间日趋完善与对等，辐射扩散明显，跨域扩散显著。从内容维度看，政策内容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同一政策领域的内容不断细化与深化。从组织维度看，类型多元与层级下移并举，协作的地级市数量逐步上升，协作组织的类型日益多元，协作中的结对层级逐步下移。

接着，谢治菊教授指出东西部协作助推乡村振兴的要点是产业协作、劳务协作和消费协作。在产业协作方面，要在继续给予资金支持、援建项目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产业合作，推进产业梯度转移，鼓励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实现资源互补，强化市场合作。在劳务协作方面，要加强东西部对口帮扶省际间劳务协作，借鉴东西扶贫协作经验，建立东西部劳务协作机制，推进东西部人员互动、技术互学、劳务对接，实现东西部地区人们的观念互通、作

风互鉴。在消费协作方面,要充分发挥东部省市经济优势、口岸优势、市场优势,推动西部地区农产品品牌、品质、供应链、价值、市场广度提升,拓宽销售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然后,谢治菊教授分析了东西部协作助推乡村振兴的逻辑、经验和矛盾。逻辑主要有四点:一是央地联动与府际协同的叠加;二是政治优势向制度效能的转化;三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四是规划引领与考核评价的协同。东西部协作助推乡村振兴有以下五点经验:一是从点轴式到制度化,协作机制不断完善;二是从穿花式到整域性,协作关系动态调整;三是从重帮扶到重发展,协作内容与与时俱进;四是依附并超越科层制,协作网络优势互补;五是多元主体共治共享,协作利益渐进均衡。谢治菊教授指出,目前东西部协作还存在着三对主要矛盾:政府、市场与社会难以共生,公平与效率难以兼顾,外力帮扶与内生发展难以同步。

最后,谢治菊教授谈到对东西部协作助推乡村振兴的思考。首先,要坚持结对主导,进一步理清国家、市场、社会关系,逐步引导我国的结对治理从国家主导向国家引导、市场与社会主导的转变,助推实现有差别共同富裕。然后,要增强结对认同,进一步强化共同体思维意识,推动东西部协作真正成为学习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助推全员化的共同富裕。其次,要进行结对竞赛,进一步完善结对考核评估机制,健全考核评估指标体系,通过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促进公平与效率平衡发展,助推实现分层次共同富裕。最后,要注重结对合作,进一步树立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外力帮扶与内生发展的关系,助推可持续的共同富裕。

潘丹: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解析、福祉影响与政策优化



2022年11月17日,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潘丹教授做客暨南大学乡村振兴大讲堂第24讲。潘丹教授作了题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解析、福祉影响与政策优化”的主题讲座。

通过梳理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政府报告和相关政策,潘丹教授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有其重要性,加强垃圾整治、污水治理、厕所改造等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全面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村农业现代化的根本目标。

潘丹教授指出,得益于中央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自2013年起,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投资直线上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建设投资呈波动上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和厕所改造等方面均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与城市相比,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力度和效果仍较为落后,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主体意识不强,二是对农户福祉的改善效果存在较大争议。

针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潘丹教授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理清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内在机制,分别研究了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新兴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二是科学测度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福祉影响;三是针对数字化时代、财政压力较大的情况提出相应的优化方案。

在实证研究部分,潘丹教授主要运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库中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关于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研究有三方面的结论:一是劳动力流动抑制了农户垃圾分类行为,其原因可能是劳动力流动增加了农村垃圾治理成本、降低了农村整体人口素质和对农村环境的关注度;二是劳动力流动分别对中西部农户、低学历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垃圾治理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三是社会资本和环境感知是劳动力流动抑制农户垃圾治理行为的两条路径。关于互联网技术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研究也有三个结论:一是相较于未使用互联网的农户,使用互联网的农户的垃圾分类意愿和投放意愿将分别提高12.9%和7.6%;二是互联网的使用明显提高了青年和中年农户的垃圾治理行为,然而,通过“电脑”上网对农户垃圾治理行为没有明显影响,互联网对高教育水平农户和女性的垃圾投放意愿没有影响,互联网对高收入地区的垃圾投放意愿影响也不显著;三是农民收入增加、生活垃圾处理行为受到监督和水污染意识提高是互联网技术促进农村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三条路径。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有三点结论:一是当每个村庄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总分的平均值增加一个标准差,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增加了1.148%和1.766%;二是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分别对中西部农民、东北部农民、老幼组农民和低学历人群农民的幸福感受具有显著影响;三是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消费支出提高和农民健康水平提高是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提高农民幸福感的三条路径。

最后,潘丹教授提出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政策优化的三点思路:一是要以数字技术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针对数字技术应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可能存在问题,潘丹教授强调,应明确界定政府职能与市场作用边界,从投资激励、成本分担、利益分享、考核评价等方面完善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机制,构建政府引导、企业运营、农户参与的农村人居环境数字化治理。二是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公私合作模式(PPP),针对过度依赖政府、落地率低的不可持续问题,因地制宜选取最优农村人居环境PPP治理方案并审慎推进,要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和居民三方共同治理体系,加强政府的管理和治理能力。三是畅通良性循环,使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和农村共同富裕互促互进,潘丹教授强调,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需要和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联系起来,不能光是整治,而是需要价值提升,从而将生态优势转化为“金山银山”。

严斌剑：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



2022年12月8日,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严斌剑教授做客暨南大学乡村振兴大讲堂第25讲。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作为我们国家的两大战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严斌剑教授从城乡关系的演化历程及其理论逻辑入手,作了题为“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主题讲座,讲座由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卢晶亮主持。

首先,严斌剑教授介绍了城乡关系演化历程及其理论逻辑的政策背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很重视农业问题,并逐渐关注城镇化发展过程,不断探索如何处理城乡之间的关系。严教授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一直追溯到十二大报告,详细梳理了城乡关系的演化历程,并提出需要把城乡和区域进行统筹考虑,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

接着,严斌剑教授综合已有研究,将新中国城乡关系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与巩固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破冰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向社会领域延伸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全面建立城乡融合体制机制阶段。同时,从历史的角度,严斌剑教授又将中国城乡关系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业社会时期,城乡关系主要是以乡育城;第二阶段是工业化前期,城乡关系主要呈现出城乡分离趋向;第三阶段是工业化后期,城乡关系演变为城乡融合发展。城乡关系演化受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的

影响,因此,必须协同推进城乡发展,避免城乡差距的恶性循环。

然后,严斌剑教授指出,缩小城乡发展与居民收入差距,需要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和城乡居民的双向自由流动。其中,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既需要城乡统一的劳动、资本和土地市场,还需要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营商环境;城乡居民的双向自由流动,则需要城乡居民享有统一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但是,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政府所能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均存在差异,这就需要明确城乡融合区域,进一步考虑区域协调发展。

谈及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重点内容,严斌剑教授从城乡融合区域、城乡居民融合、城乡产业协同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在城乡融合区域方面,城市、县城、乡镇、乡村未来社区,谁是城乡融合的重要区域?理论界对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严斌剑教授认为,在不同的阶段,各个区域的重要性会有所差异,但从总体上来看,各个区域都很重要。在城乡居民融合方面,主要考虑的是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包括收入差距、耐用品消费差距、教育差距、创业创新差距和健康差距。缩小城乡差距,既是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目标,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在城乡产业协同方面,应该以发展覆盖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的涉农产业为重点,通过连接城市消费者和乡村生产者,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最后,严斌剑教授通过成都、苏州、开远和江苏宁锡常接合片区等地区的具体实践,总结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需要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为了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严斌剑教授提出了三点思路:一是要持续不断增加农民收入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二是要坚持不懈促进涉农产业发展以缩小城乡发展水平;三是要在不断改革中提升中央与地方政策效力,激发基层活力和群众的创造力。

暨济一堂 - 乡村振兴主题研修班

彭小辉：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的发展建设的经验



2022年10月13日,暨南大学-国强公益基金会乡村振兴研修班第9期课程顺利举行。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彭小辉教授受邀为学员上课,本期课程的主题是: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的经验。

首先,彭小辉教授追溯了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提出的背景。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紧接着,2018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全面部署。2021年浙江省被设立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坚定决心。对于共同富裕,早在“一五计划”实施期间,毛泽东就指出“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到“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彭小辉教授指出,就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两者关系而言,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在乡村,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举措。作为第二个百年的两大战略,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总目标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两者有着一致的原则,那就是兼顾增长与分配、效率与公平;两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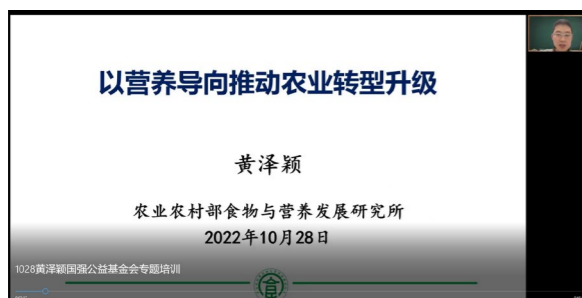
实现路径一致,都离不开“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的“三有”协同,需要“看得见的手”、“看不见的手”、“仁慈之手”三手优势互补、共同发力。

接着,彭小辉教授阐释了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乡村振兴是推动共同富裕、解决我国城乡、区域、产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及城乡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主要抓手。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总体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培育乡村产业的内生发展动力,是做大做强共同富裕“蛋糕”的坚实保障。生态宜居是内在要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农村生态资源在政策、资金、技术的有效配合下可以转化为生态资本,生态优势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治理有效是保障。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目的。生活富裕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乡风文明为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提供思想保障和精神支持。最后,彭小辉教授介绍了浙江的成绩和经验。曾经的浙江虽然地理位置较好,但受限于山区较多、土地狭小,其人均资源少、农民收入低。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济快速发展,其兼顾效率与公平,在推动高质量建设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1978年,浙江省人均GDP为337元,仅为当时全国平均水平的87%;2021年,浙江省人均GDP已是全国人均GDP的1.42倍。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小于全国和主要发达省份,2021年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9,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而相邻的江苏省为2.2。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的实践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是用发展的眼光解决发展中的难题,比如充分

挖掘地区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农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二是注重缩小城乡差距，比如构建闲置农房激活长效机制，积极探索“农房+农地”“农房+产业”“村集体+农户”等新模式，变“沉睡资产”为致富活水。三是注重缩小区域差异，比如对于南部山区的贫困县人口，采取“下山移民”，统一搬迁、安置，通过直播带货等电子商务方式销售当地农产品，带动村民实现增收。四是注重缩小收入差距，充分发挥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收入分配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提高低收入群

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调节高收入群体收入。五是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加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覆盖水平，实现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共享。六是视农民大众为主体，把农民大众作为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主力军和主人翁，以农民主体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来实现共同富裕。

黄泽颖：以营养导向推动农业转型升级



2022年10月28日，暨南大学-国强公益基金会乡村振兴研修班第10期课程顺利举行。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黄泽颖老师受邀为学员上课，本期课程的主题是：以营养导向推动农业转型升级。

黄泽颖老师首先介绍了营养导向型农业的概念背景。营养不良一直是困扰全球的重要问题。目前，全世界的营养不良表现为三种形式：贫困地区人群的营养不足、发达地区人群的营养过剩以及全世界的微量营养素缺乏。农业系统如何满足营养健康需要？食物系统如何推动营养不良问题解决？探寻农业、营养、健康的关系成为全球农业发展研究的热点。2013年前后，多位学者首次提出营养导向型农业概念。201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指出，营养导向型农业是一种以可持续的方式满足居民膳食需求的新型农业范式或方案，旨在确保生产量足质

优、价格合理、营养丰富、文化适宜且安全的各种食物，营养和健康是最终目标和衡量标准。”这一概念跳出传统的食物生产局限，以系统论的观点审视农业生产，强调从食物系统角度出发，拓展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使营养健康成为农业发展的最终目标。2017年12月14日，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与FAO驻中国办事处联合举办研讨会，提出将Nutrition-Sensitive Agriculture (NSA) 翻译为“营养导向型农业”，标志着这一概念正式引入中国。2019年，“发展营养导向型农业和食品加工业”写入《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

接着，黄泽颖老师介绍了营养导向型农业的政策规划。为解决营养问题，FAO提倡从食物价值链的各个阶段（生产、加工、零售、消费）采取行动，提出了营养导向型农业涉及的5个领域20项干预措施、投资规划的10项基本原则以及6项核心评价指标。在FAO政策规划指导下，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先后制定了本国的营养导向型农业政策。我国于2016年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先后颁布了《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等相关政策规划。这些政策规划带给我们三点经验启示：一是要以系统观点重新认识农业、营养与健康三者的关系；二是要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分析农业与食物系统存在的问题；三是

要以营养导向重新构建农业产业链和食物营养价值链。然后，黄泽颖老师对我国的农业与食物系统进行SWOT（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Threats）分析。在挑战方面，一是我国的营养不足问题虽得到根本改善，但超重肥胖以及膳食不平衡导致的慢性病问题日趋严重；二是全球地缘紧张、气候危机、逆全球化以及“数字化恐慌”等问题给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三是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与居民营养需求还不相匹配。在威胁方面，我国农产品供给的资源压力加大，具体表现为耕地数量不断减少和农业用水供给缺口较大；我国农产品全产业链损耗浪费严重，每年浪费的粮食可养活约2亿人；我国城乡人口结构变化迅速，“谁来种地”成为农业生产面临的重要问题。在机遇方面，一是国家的战略规划为农业转型升级营造了良好的政策氛围；二是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食物供给和消费提出了新需求；三是大健康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市场潜力巨大。在优势方面，

新世纪以来，我国食物产量成就显著，为营养导向型农业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另一方面，我国营养健康产业创新活力十足，营养导向趋势明显，产品种类不断丰富。

最后，黄泽颖老师就如何推进营养导向型农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几点思考。在发展思路方面，要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最大程度地利用当地资源满足当地人的食物需求；要以“营养导向”为理念，将农业生产与居民营养健康状况和膳食营养需求相结合；要以“资源禀赋”为出发点，发展适合当地的特色优势种植产业。在发展建议方面，一是要加快营养导向型技术创新和营养标准建设；二是要大力提倡适度加工、精准加工，推动农产品加工减损增效；三是要大力推进食物营养知识普及和居民食物消费引导；四是要尽快建立健全营养导向的可持续食物政策体系。

韩嘉玲：城镇化浪潮下中国乡村教育的变迁与实践



2022年11月18日，暨南大学-国强公益基金会乡村振兴专题培训第十一期课程顺利举行。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讲座教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受邀为学员上课，本期课程主题为：城镇化浪潮下中国乡村教育的变迁与实践。韩嘉玲老师主要从乡村教育的

发展与变迁、乡村学校的类型与布局、城镇化浪潮下乡村学校面临的困境以及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学校的变革与探索路径四个方面阐述我国乡村教育的变迁过程与实践探索。

首先，韩嘉玲老师简要介绍了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2001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规定各地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这就是所谓的“撤点并校”政策，该政策改变了我国乡村传统的“读小学不出村，读中学不出社”的基本格局。本世纪以来，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基本改善了我国乡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办公经费、教师工资及免除学生杂费及

课本费等农村长期面临的经费不足与学生负担重等问题。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实施了十余年的“撤点并校”虽被叫停,但新的格局已经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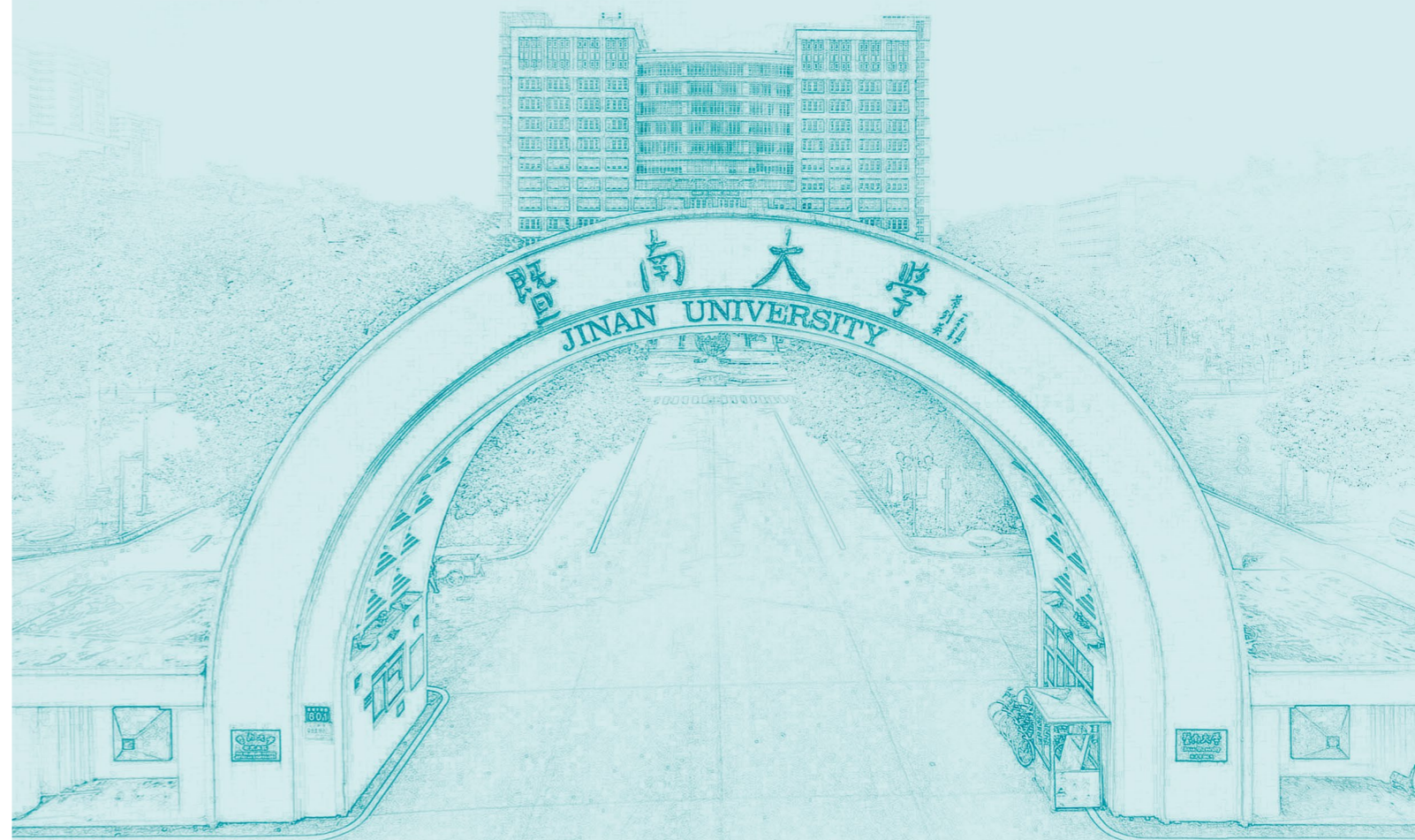
本世纪以来,随着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和少子化趋势及城镇化、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学校面临“乡弱城挤”的局面。城镇形成了大量大规模、大班额学校。虽然2015年以来,教育部三令五申消除大班额现象,根据教育部最新统计,到2021年我国56人以上的大班和超大班仍然还有2.1万个,66人以上的超大班482个,可见城镇学校依然还存在着生源涌入的压力。与此同时,全国农村寄宿生群体规模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农村寄宿制学校已经成为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的承载主体,集中了大量的留守儿童。农村小规模学校虽然规模小,分散在各地,但学校数量占比高,是教育体系的神经末梢学校,据统计,农村小规模学校在2017年有10.7万所,占农村学校的44.4%。至此,我国形成了乡村小班小校和城镇大班大校并存的基本格局。

随后,韩嘉玲教授指出,村小/农村小规模学校面临着资源不平衡、教育质量难以提升以及恶性循环三大困境。其中,资源不平衡主要体现在经费分配、教师队伍建设和城乡资源分配三个方面,从经费分配来看,由于生源少,在以人数为主的拨款机制下农村小规模学校获得的经费较为有限;从教师队伍建设来看,由于乡村学校地理位置偏僻,教师的职业发展也面临很大问题,普遍面临着下不去、留不住的现象;从城乡教育资源分配来看,农村地区往往难以获得好的教育资源。同时,受生源、教学、学生学习条件较差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教育质量很难得到提升。而由于教育质量差,学生大多选择进城上学,导致生源不断流失,学校慢慢萎缩,成为“孤岛”中的学校,这又进一步造成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难以提升,使农村小规模学校陷入恶性循环的发展困境。

最后,韩嘉玲教授提到,撤点并校虽然有利于保证生源数量、整合优化教育资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生上学的距离,加重了部分农民的教育负担,淡化了人们对家庭、家乡的认同感,村小仍在各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破除村小学校面临的困境,韩嘉玲老师以《小

而美: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故事》一书为例,讲述了一些农村小规模学校如何通过共同体的建设和关注每一个儿童的发展来展开实践的探索,成功改革。一方面,通过加强与社区、其他小规模学校的联系形成区域联盟,营造儿童友好校园,建立互帮、互助、互学的教师关系以及更为紧密的师生关系,成为村寨里大家的学校。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农村学校的小规模优势,以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实施差异教学、创新教学组织形式等方式,发现儿童闪光点,接纳特殊儿童,真正做到关注每一个儿童的发展。关于学校如何开展乡土文化课程,韩嘉玲教授提出以下四个要点:一是养成教育从日常生活着手,二是乡土认同从地方历史文化开始,三是学科知识从乡土文化中学习,四是乡土/日常生活经验助力学科教学。这些乡村学校的实践提供了低成本、可复制的本土经验探索,为翻转乡村教育走出一条不同于城市学校教育的新路径。

数据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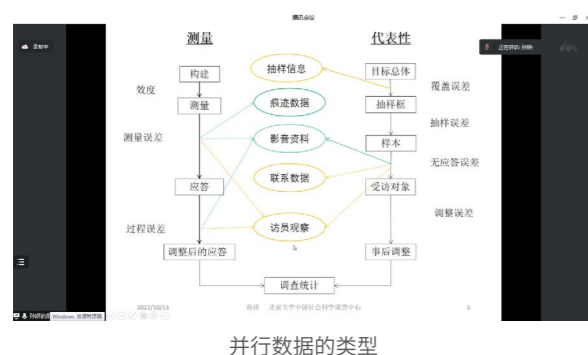
“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

北京大学孙妍：运用并行数据评估调查质量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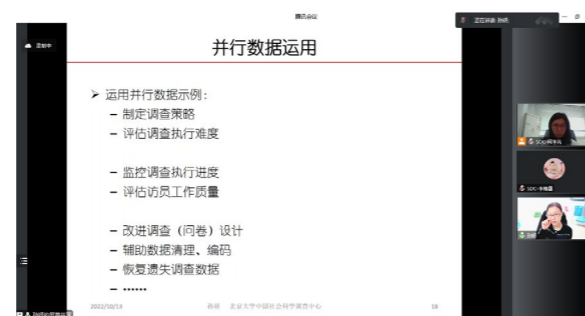
10月13日，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邀请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副研究员孙妍担任“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第35期的主讲人，基于她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的主管实施经验，向线上参会的师生重点介绍了并行数据的种类、特点，以及如何运用并行数据对问卷的设计质量、访员执行情况及访问模式切换的影响等情况进行评估。

主讲人孙妍具有多年大型综合性社会调查项目的设计及管理经验，先后负责中国养老与追踪调查（CHARL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大旗舰追踪调查项目的问卷设计与调查组织管理。其研究领域为社会调查方法，侧重调查数据质量评估。

讲座中，孙妍首先介绍了并行数据的定义、种类与特点。并行数据是指在调查数据收集过程中记录下的，与调查执行相关的各类信息。根据并行数据的获取方式，可将其分为附加类数据与采集类数据。附加数据是在访问过程中可由计算机辅助调查系统自动记录的数据，如访问用时情况、鼠标键盘操作痕迹数据、访问录音等；采集类数据则需要额外花费人工记录或整理，如各类访员观察数据、样本联系记录、访问行为编码等。孙妍指出，并行数据的种类丰富，具有数据采集层次多样、结构差异大、数据加工复杂以及采集类数据质量难保障等特点。



并行数据的运用可以有效辅助制定调查策略、评估调查执行难度、监控调查执行进度、评估访员工作质量、改进调查（问卷）设计以及辅助数据清理等。以用时数据为例，访员在访问过程中耗费在每项操作上的时长可以根据研究需要在行为、题项、模块或整体访问等不同层面上进行汇总。其中，以单题访问时长为例，作为问卷评估中最常用的时长指标，单题访问时长过长代表该题目从提问到获取答案的过程持续时间较长，可以解读为题目的问答环节存在一定困难；而时长过短则通常是由访员背离访问规范或受访者跳过部分思考过程引起的，这可能会影响相关题目的数据质量。因此根据单题访问时长数据能够有效筛选异常题项，为问卷设计和修改提供参考依据。



并行数据的应用

为了能够更直观地理解并行数据在问卷评估中的使用，孙妍主要介绍了三个运用并行数据改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问卷设计的案例。案例详细展现了各类并行数据的分析与应用，探讨了涉及就业状态界定、时间利用测量与家庭间财务往来相关题目的潜在问题。除此之外，孙妍还分享了运用并行数据制定联系策略与培训访问团队的经验，描述并行数据分析下电访与面访在完访时间、问卷类型人群特征与时间偏好方面的差异情况，展示了使用并行数据对执行进度及数据质量监控的实践

方案。在讲解并行数据综合运用示例时，孙妍特别强调应当注意控制样本选择偏差，正确使用数据对比，以保证所得结果能够相对准确反映调查特征与现象。

讲座最后，孙妍回答了参会师生关于如何设定单题标准时长、以及如何取舍问卷题目、保证访问规范等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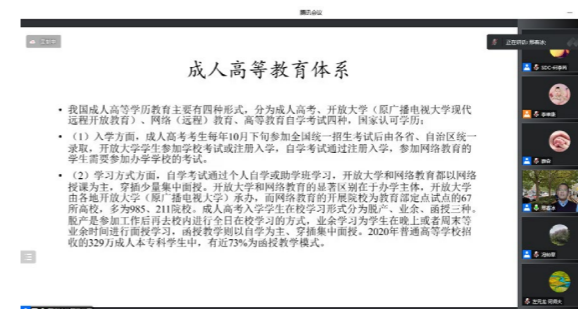
题，双方积极交流，更加深入地探讨并行数据在社会抽样调查中的应用方案和应用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邢春冰：成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回报与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

11月7号，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邢春冰担任“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第三十六期的主讲人，分享其关于成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回报与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的研究成果。

主讲人邢春冰，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的城乡移民、工资结构、人力资本和教育政策，在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等多本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60 余篇。

讲座开始，邢春冰首先介绍了成人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背景。过去三十年，我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大幅提升。与此同时，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大学扩招大幅提高了人群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尽管如此，仍有很多人无法进入普通高等教育体系。成人高等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相关文献数据仍然匮乏。



我国成人高等教育体系

紧接着，邢春冰针对成人高等教育体系展开了详细的讲述，介绍了成人高等教育的主要形式、招生流程及学习方式。通过招生信息以及对历年普查数据同一年龄段在不同调查时间点获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较，研究推算出成人高等教育的规模，并且对成人高等教育地区分布和随时间变化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由此发现，60、70年代出生的人群，有相当大比例是通过成人高等教育获得大学以上学历；而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随着高等教育扩张，通过成人高等教育获得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下降。成人高等教育实际上为人们学历提升提供了很大的作用。



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的规模及其分布特征

为了进一步探究选择成人高等教育群体的特征以及成人高等教育的工资回报，邢春冰使用了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2018）数据，通过将成人高等教育群体与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获得者进行比较发现，一些不可观测

的个人特征影响了人们对于成人教育的选择及其后续工资回报。总体而言，成人高等教育的回报率显著低于普通高等教育。

此外，邢春冰还进行了成人高等教育与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通过数据探究成人高等教育对各阶段教育回报率估计的影响。研究发现，成人教育毕业生的收入没

有显著地高于高中毕业生，成人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增值效应比较有限。这一研究结果也反映了现实中成人教育发展的现状和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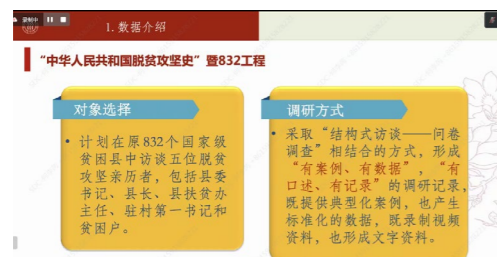
讲座的期间，我院冯帅章院长、薛森副教授及其他参会师生先后提问，与主讲人进行深入讨论，线上讲座学术交流气氛活跃。

中国人民大学陈佳莹： 减贫与可持续发展中的政府登记数据

12月26日，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第三十七期顺利开讲。受邀担任本期讲座的主讲人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陈佳莹，她向参会师生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脱贫攻坚史”系列调研访谈项目的调研方式，并对政府登记数据在减贫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进行探讨。

主讲人陈佳莹，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包括发展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文章发表于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精准扶贫影响教育不平等研究”。

讲座伊始，陈佳莹首先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脱贫攻坚史”系列调研访谈项目的对象选择和调研方式以及预期成果。该项目在原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开展，通过“结构化访谈-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在每个贫困县中均访谈五位脱贫攻坚亲历者，积累了大量数据及一手访谈资料。成果中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构建了“全国832个贫困县大型微观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了我国当时所有贫困人口基本信息、村基础信息、基层干部信息、政策实施数据等信息，在多个学科领域具有研究参考等实用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脱贫攻坚史”系列调研访谈项目的对象和调研方式

在讲述政府登记数据的结构和特点的过程中，陈佳莹明确指出政府登记数据具有流程准确、结果准确的特点，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变量少，这时需扬长避短，充分挖掘数据特点，通过结合其他数据和进行数据收集的方式来进行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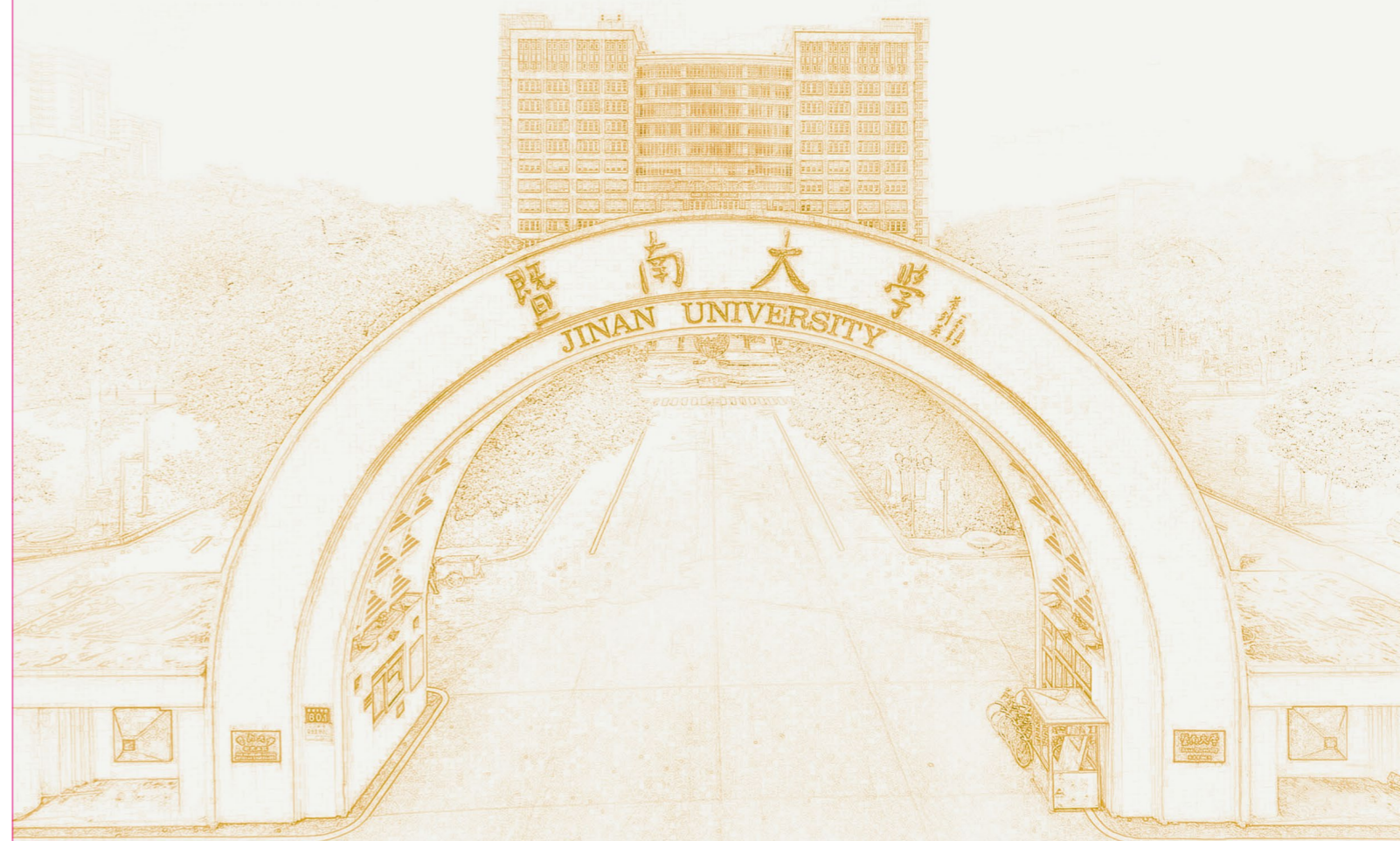
序号	内容
1	中国贫困人口数据库
2	中国贫困县数据库
3	贫困人口产业扶贫数据库
4	贫困人口产业扶贫数据库
5	贫困人口产业扶贫数据库
6	贫困人口产业扶贫数据库
7	贫困人口产业扶贫数据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脱贫攻坚史”系列调研访谈项目涵盖的数据信息

现有的政府登记数据适用于政策评估、减贫与可持续发展、一般性经济学问题方面的研究。讲座中，陈佳莹以光伏扶贫项目为案例向参会师生展示了如何在学术研究中应用政府登记数据。光伏扶贫是中国脱贫攻坚过程中兼顾绿色能源发展与减贫的项目之一，该研究将其作为一个村级的扶贫措施来评估它的经济和社会收益。

讲座的最后，陈佳莹与线上听众积极互动，回答了参会师生们关于数据准确性等问题，现场交流气氛活跃。

学生天地



培养动态

熙诚致远许峻铭总经理 带你规划新职场，重识金融界



为提升学生职业发展意识，引导学生合理定位、树立目标，规划学习、规划人生，我院特邀请熙诚致远私募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许峻铭为学子线上开展金融专业职业规划专题讲座。讲座由我院助理教授张毅主持，吸引了 50 余位学子参与。

许峻铭曾就读于武汉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央广经济之声和央视财经频道特约评论员。已取得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英国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资深会员、高级企业合规师、微软人工智能专业认证、阿里云云架构师资格。现担任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金融专业硕士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校外导师。曾就职于安信证券投行部、建信信托投行部和金融街资本投资部，具有丰富的资本市场业务和股权投资项目经验，涉及已成功案例超过 20 个，覆盖行业包括金融、人工智能、硬科技和信息技术等。

许峻铭从自己的专业——金融学科谈起，从金融的本质到金融行业的分类，为同学们系统而深入地厘清了专业学科与行业发展之间的连结与逻辑关系。而后，许峻铭对金融行业岗位进行了详细地介绍，明确了金融专业的“对口”就业方向，即证券公司、外资投行、精品投行、VC/PE、实业（投融资部）五大方向。

那作为在校学生，大家可以为进入金融行业做哪些准备工作？许峻铭针对这一问题首先在技能方面给出指导，他强调大家要“摆脱学生思维”，在沟通技巧、研究能力、认知水平三方面进行针对性训练。其次，许峻铭介绍了各个职业方向所必须的“硬性”入门槛，即证券从业资格证、CPA、CFA、基金从业资格证等专业证书，为同学们的生涯规划提供了基础和方向。

面向未来，许峻铭基于从业经验，对行业未来的宏观走向进行展望。许峻铭认为，2008 年的金融危机影响犹在，债务周期仍是一道难题，市场中风险从未消退。而中美关系的重构，也势必引发经济新常态。许峻铭认为，应当把经济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讲座的最后，许峻铭向同学们介绍了自己所任职的熙诚致远，并结合公司需求，进行了岗位的介绍与推荐，鼓励优秀同学踊跃投递简历，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

学子风采

刘哲文：求学在南洋，做人生体验派



刘哲文，暨南大学经济社会研究院（IESR）海外硕士留学准备课程校友，本科就读于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现就读于新加坡管理大学（SMU）。

“读书一方面是学习知识，一方面是开拓眼界。”聊起申请国外学习的原因，刘哲文给出的理由简单又清晰。



SMU校园

站在人生的路口

与本科期间就着手准备申请材料的同学不同，出国并不是刘哲文最开始的选择。2021 年，刘哲文参加了全国硕士统一入学考试（即“考研”），初试折戟的他，犹如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即将被人流推向某个选择。是二战还是直接工作？有没有更适合自己的路？刘哲文问

自己。

刘哲文所在的经济学院与 IESR 是兄弟学院，他从老师那里了解到了 IESR 海外硕士留学准备课程，抱着“多了解了解也好”的心态，他开始关注准备课程的消息。“还是想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文化”，拿到 offer 那年，正值疫情稳定，出国海关放开，刘哲文如愿登上前往他乡的飞机。

求学在南洋

“我看到留学准备课程里有林威老师授课，她可是伍德里奇的大弟子呢！”过硬的师资是刘哲文选择 IESR 的一大原因，聊起准备课程质量，他同样不吝赞美，“准备课程的所有授课教师都有海外留学背景，给我们打了很好的基础。”



SMU校园大楼

“国外的老师都很有脾气，他觉得你本科应该学过的东西他绝不会复述。”不重复、不复盘、不照顾，面对如此“硬核”的授课方式，刘哲文直言“有些吃力”。他也再次告诫师弟师妹：“如果大家本科不是学经济学的，或者不是全英授课的，一定要充分利用准备课程打好基础，不然到了国外自己要再花更多时间去起步。”对于本科已经是经济学的同学，刘哲文同样建议大家报名 IESR 项目，“新加坡这边的学校是强制要求先上半年预科课程的，只是在国内上还是在国外的区别，在 IESR 上的话能节省很多生活花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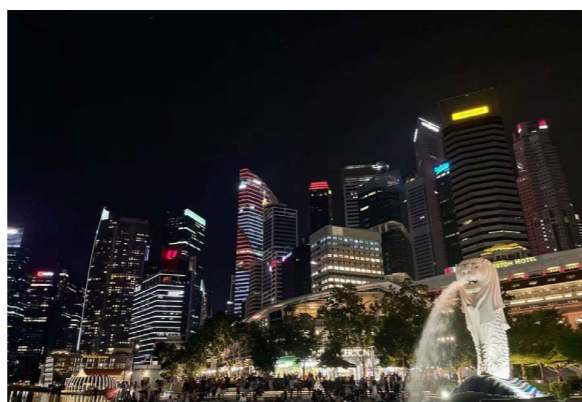
SMU教室

国外求学有许多需要适应的地方，由于对版权的重视，课堂上不允许学生对教师授课内容进行录音，这给刘哲文最开始的学习带来了不小的阻碍。“老师们来自各个国家嘛，又是英语授课，有时讲得快一点就跟不上了，也不能录音拿回去重新听。”课前预习、课后复习是刘哲文给出的“笨方法”，虽然简单，但也有效，他逐渐适应了学校的上课节奏。

做人生的体验派

SMU 的硕士课程大多安排在晚上，这样的课程安排给了学生很大的自主性，也给了刘哲文更多了解这个国家的时间。

SMU 坐落于新加坡中心最繁华的地段，是典型的开放式校园，“新加坡有些像小美国，你能在这里见到来自任何地方的人，我们的老师里就有斯里兰卡人，想去马来西亚也可以坐公交去。”异域的风景、交融的文化，给艰深的求学时光带来了鲜活的亮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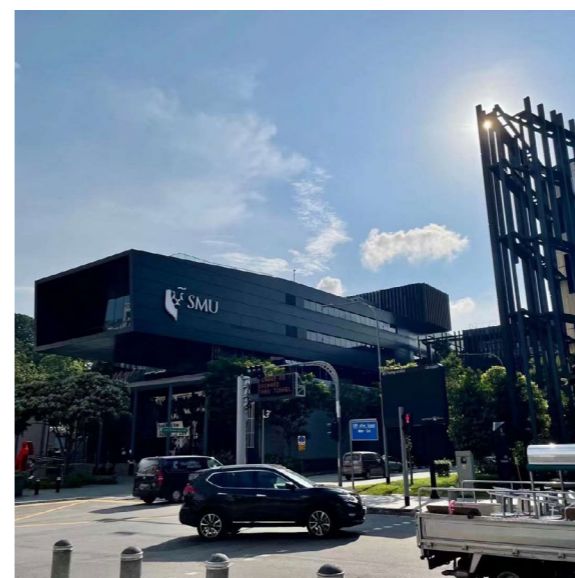
夜幕降临的新加坡

“我们学校就业率是超过新加坡另外两所（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用的是和麻省理工学院合作的教材，新加坡本地企业认可度很高。学校对面是阿里巴巴海外部门的大楼，实习也很方便。”聊起学校的就业优势，刘哲文如数家珍。



SMU校园

刘哲文将出国留学的经历看作一段十分难得的人生体验，他很享受当下劳逸结合的生活状态：“这边硕士只有一年，还是比较短暂的，而且正好二十多岁是个人生节点吧，去国外看看，也是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SMU校园

近年，有关“水硕”的讨论渐沸，部分同学出国看重的是相较于国内较轻的学习压力。“抱有这样心态的同学不适合来 IESR 的项目。”刘哲文毫不避讳地指出，“在 SMU 的学习压力是很大的，课程的强度比国内大很多，作业也很多，要很自律才能学好。考试也很严格，我们班期中考有门课平均分只有 50 多分。”

“比大多数人更了解世界”

聊起未来，再次站在人生路口的刘哲文有了比两年前更清晰的规划。“以后还是想继续读博深造，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他比起其他社会学科，都更接近科学，我觉得如果能在这样一门科学学科攻读博士学位，那确实是要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个世界。”IESR 同样在刘哲文攻读学位的规划里，“IESR 学术氛围浓郁，老师都很年轻，很有活力，我比较喜欢这样的研究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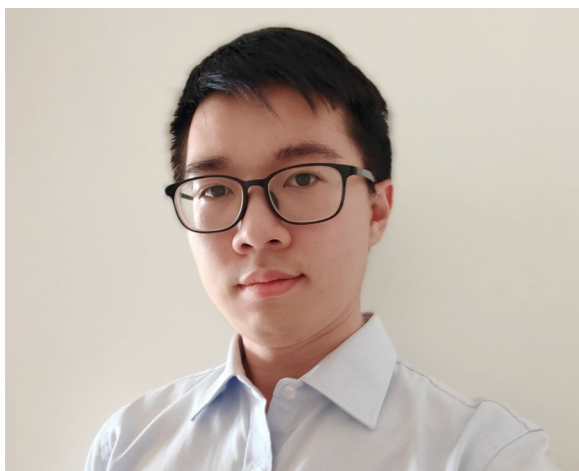


“I love SMU”

“我有个学姐，是我们学校 16 级国贸专业的，她也是通过 IESR 准备课程去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她给了我很多建议。”刘哲文将这位学姐看作自己的“引路人”，他希望自己的经历也能给后辈们一些参考和启发。

当问起想要给后辈们什么建议时，刘哲文笑道：“好好学英语，好好学数学！”

卢豪江：人生规划尽量趁早，找到自己的“坐标”



卢豪江，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海外硕士留学准备课程校友，本科毕业于上海政法学院经济学专业，现就读于新加坡管理大学（SMU）金融经济学专业。



SMU校园

“近水楼台”的相遇

卢豪江出生于广东佛山，作为本地人，他很早就对暨南大学有所了解，虽然本科并没有在暨大就读，但在进行出国申请的信息收集时，他很快注意到了 IESR。“现在出国留学的主流渠道还是以中介为主，通过学校项目出国还是比较少的。我有高中同学在暨南嘛，就比较早知道了这个项目。”卢豪江向我们说起与 IESR 的“结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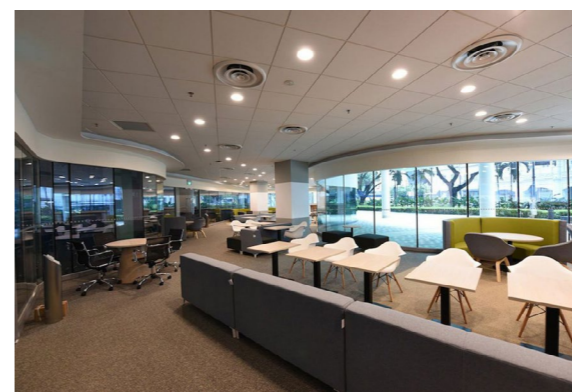
卢豪江顺利通过了面试甄选，IESR 小而精的教学模式既有惊喜，也有挑战。“IESR 准备课程人很少，我们当时班上就三到五个人吧，很有沉浸感，也很有趣。”说到这里，卢豪江话锋一转，“但老师会比较高频地问你问题，要求也比较严格，大家一定要放得开，抓住机会和老师互动。”准备课程给卢豪江带来的影响是贯穿始终的。“拿数学举例吧，现在硕士这边没有专门的高数课，但不管上什么课，都要用到数学。”提到授课质量，他不禁感慨，“在 IESR 一定要好好上课，之后在学校会用到，会考到。”

严以治学，注重就业

SMU 拥有亚洲顶尖的计量经济学专业，教学与考核都十分严格，卢豪江与我们分享了一则趣事：“教我们宏观的老师，他的平时作业、期中考试题目都是自己出的。有次考试他抱着卷子过来，胡子看起来三天没刮了，我们都在猜他是不是三天没睡都用来出题了。”

新加坡管理大学十分注重就业培训，除设置实习指导课程外，也可以通过参加实习的方式冲抵学分。“SMU 是一所专业型院校，与综合性大学的海纳百川不同，它的专业以商科为主，没有理工科，学术研究氛围相对弱一些。”对于 SMU 在学科设置上的特点，卢豪江给出的评价很中肯，“它好就好在它是偏向就业的，它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导向是可以看出这一点的。”

或许是受到学校务实风格的影响，卢豪江对自己的未来规划比较清晰，除了学历的提升，他希望自己能在实践经历上也有所积攒。“短期内打算留在新加坡这边工作几年，长期的规划还是比较想回国。有海外工作经历，比起只有学历要好很多。”除了完成学分规定的课程，卢豪江也注重课堂之外的自我提升，努力准备银行、证券公司相关的证书考试。



SMU教室

在熟悉中体验新奇

华人占比较多、中华文化氛围浓厚是卢豪江选择了新加坡的原因，这也让卢豪江更快地融入了新的生活环境。“在这里我常常怀疑自己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卢豪江开起玩笑，“经常一出地铁口，左边贡茶，右边面包新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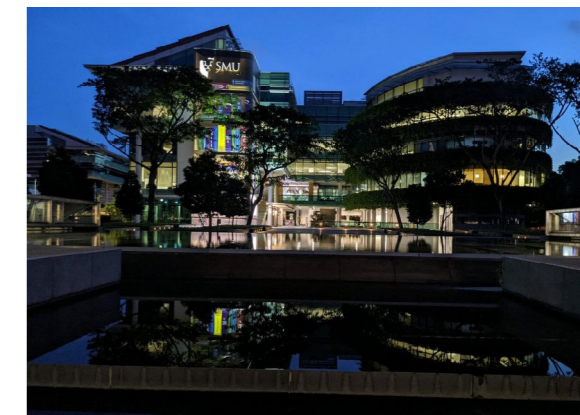


SMU周围街景

在亲切熟悉的环境里，却也有新奇的生活体验。SMU 在课余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学生活动，卢豪江选择参加学校举办的研讨会和讲座，这些研讨会基本不设参加门槛，给了学生们很多选择。“我上次去参加的研讨会很有趣，大概二十多个人一起去徒步，边走边进行学术探讨。”

找到自己的坐标

与 IESR 合作的院校，大多提供了两个或以上的专业供同学们选择，卢豪江也曾在经济学与金融经济学之间犹豫。“我本科其实是经济学专业，但考虑到自己数学能力和兴趣偏好，最后申请的专业是金融经济学，比起经济学会不那么‘理科’。”一番考虑过后，卢豪江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SMU夜景

“如果有海外申请的意向的话，还是尽量早做准备，能选择的学校也会更多些。”稍作思考后，卢豪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也建议大家的职业规划、人生规划都尽量趁早，虽然不一定会实施，但可以用来鞭策自己，也是不错的。”

陈晨：人生的路上你只需要和自己赛跑



陈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海外硕士留学准备课程校友，本科毕业于暨南大学国际学院金融专业。现就读于新加坡管理大学（SMU）经济学专业硕士项目。

念念不忘，果断行事

陈晨还在幼年时，便表现出对理财知识的好奇，父母十分尊重她的兴趣，曾开玩笑地预言女儿“以后一定会读经济专业”。高考填报志愿时，陈晨所在省份仅能报考国际学院金融专业，本想进入经济学院的她只好“曲线救国”，进入国际学院学习。在金融专业深入学习后，她慢慢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金融像是经济的孩子，了解孩子之后，也想看看父母是怎么样的。”陈晨用一个奇妙的比喻概括她对两个专业的理解。

临近毕业，时逢新冠疫情在国内首次爆发，未能顺利返校的陈晨在家与图书馆之间两点一线，撰写毕业论文。一天，她收到舍友发来的消息：“这个项目很适合你，要不要试试！”陈晨点开舍友发来的照片，正是 IESR 海外硕士留学准备课程的项目介绍。IESR 海外硕士留学准

备课程提供了另一种升学选择，经济学的小小火苗又在陈晨心中复现。

陈晨从小便很有主见，许多事都自己拿主意。“基本上重大决定都是我自己做的，家长不太会干涉。”当陈晨提出希望参加 IESR 项目，申请海外院校时，父母也表示尊重她的选择。此时，距离截止申请仅剩余一周时间，在向项目负责人唐老师进一步了解项目后，陈晨当即动身，从天津飞往广州参加面试。“我是杀回广州的，然后马上开始上课。”

从开始了解到付诸行动，陈晨只用了两天。十天后，她开始准备 SMU 的面试。

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准备课程为有申请意向的同学提供四门基础课的教学，“大一学的很多知识都遗忘了，要再捡起来、拾回之前的记忆是很难的。”陈晨表示，准备课程帮助她重新打好基础，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知识框架，顺利地衔接上了国外的硕士课程。



SMU 校园风光

许多同学因准备课程全英授课、严格考核的教学形式而退却，产生畏难情绪，也曾有课程校友表示老师上课十分“硬核”，不好消化。陈晨在后半程才加入，谈起准备课程的学习强度，她却显得十分轻松：“这四门课是有区分度的，慢慢地从基础到中阶，然后再到高阶，一步一步跟着老师来，还是比较容易跟上进度。”准备课程合理有序的课程安排、宽严并济的教学态度、循序渐进的授课模式，为陈晨搭起了逐渐进步的阶梯。

除了核心衔接课程教学，留学准备课程同时提供申请指导，让同学们安心地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学习之中。“海外申请一步一步地按照老师们给的指导走就好，学长学姐也会给一些建议。”陈晨向我们分享申请院校时的心得，同时也向同学们强调，自己的付出不能懈怠，“像语言成绩和入学的面试，还是要自己上去准备，不能依靠别人。”

顺畅衔接，开启新“副本”

在准备课程打好基础，熟悉专业知识与学术英语的表达后，语言没有给陈晨在听课方面造成太多障碍，却在生活中设了小小“陷阱”。“我们的印度教授英语已经算印度裔里很不错的了，平常去买东西，店里的工作人员说的英语都很有‘味’。”



新加坡植物园

“南洋理工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偏一点的地方，我们学校就在市中心，很繁华。”陈晨介绍道。SMU 属于没有围墙的开放校园，未设有学生宿舍，在抵达新加坡前，陈晨曾担心房租开销会比较难以负担，“但是到了这边发现还好，住得远一点也没关系，这边交通很方便，通勤时间不需要很长。”



SMU 旁的教堂

诸如租房的大小困难，陈晨一一克服，慢慢找到了学习与生活的节奏，她与我们分享起在新加坡的见闻。“新加坡是赤道边上的国家，全年都很热，所以这边商场之间都有地下通道，能不走地面就不走地面。作为一个外国人，能感觉到这个国家的包容性，能遇到很多不同种族的人，像印度人、马来人，他们都很友好。”

人生没有固定的时间表

陈晨的同学中，有许多人令她印象深刻。“我们班上就有很多年龄比较大的学生，可能工作了很多年，又重新回到校园。”多民族、多年龄、多语言，新加坡的“多元”被陈晨反复提起，正是这份多元包容，给了陈晨新的体悟，“不一定要什么年龄就干什么事，不要跟同龄人比较，你的对手只有你自己，人生的路上你只需要和自己赛跑。”



陈晨遇到的蜗牛

从幼时兴趣萌发、到高考阴差阳错，再到如今愿望成真，一路走来，陈晨颇有感慨：“我觉得有想法了就不要犹豫，要马上去实施，那就已经比别人强很多。”